

五四運動初期江蘇省教育會的 南北策略

陳以愛

摘 要

本文對五四運動的研究，把考察焦點放在上海的江蘇省教育會。1919年前中國南北分裂期間，江蘇省教育會以南方作為根據地，在長期積極經營下，往北京拓展其勢力。五四運動爆發後，江蘇省教育會支持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及教育總長傅增湘先後去職，為該會擴展過程中的重大頓挫。然而，江蘇省教育會利用電報往還，策動南北輿論，巧妙地與學潮呼應，與安福系暗中角力，既隱含南北力量的交鋒，也掀動五四運動的波瀾起伏。本文提出的主要論點是，欲瞭解一部五四運動史，若不深悉江蘇省教育會的布局、謀略及運作方式，都不免簡化或扭曲這段歷史的進程，難以獲得五四運動史的全貌。

關鍵字：1919年、五四運動、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申報》

The Strategy of the K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Joseffin Sae-chen*

Abstract

This thesis looks at the role of the Shanghai K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江蘇省教育會)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五四運動). Shortly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before 1919, China was separated into the north and south regions. During the time, the K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increased more and more its influence in Peking. Supported by the Association, Ts'ai Yuan-p'ei (蔡元培),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Fu Tseng-siang (傅增湘), Minister for Education Department, both resigned after the May Fourth Event. Their departure frustrated seriously the development of influence in the North China by the K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The leaders of the Association made instead the use of telegrams and mass media, and tried their best to instigate public opinion in support of the students' movement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the Ann-fu Clique (安福系). The Chinese political authorities in the north and south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during that time, driving the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conclusion, the main point of this thesis is to emphasize the point that the scholars have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role of the K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therwise, we can never tell the whole sto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Keywords: 1919, May Fourth Movement, K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Peking University, *Shen-pao*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of Tunghai University

五四運動初期江蘇省教育會的 南北策略*

陳以愛**

壹、前言

從清末到民初，隨著新式教育的普及，學生人口不斷擴增，成為牽動政潮、推動社會運動的中堅力量。¹ 1919年前後，中等以上學校師生再度活躍，占據歷史的中心舞臺。其中，五四學生運動的爆發，尤其引起研究者關注，相關論著已達到汗牛充棟的地步。從研究成果看，北京大學師生的活動最引起關切，並形成一種以北大為中心的論述框架。近年來，隨著歷史文獻不斷刊布，研究者漸漸脫離舊有框架，意識到重新審視及解釋這段歷史的可能性與必要性。² 2007年「近

* 2009年本文構思期間，曾應邀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得以利用豐富的館藏資料。蒐集資料及寫作過程中，復承呂芳上、馬忠文、王良卿、孫慧敏、王信凱諸師友指點，陳漢伯、高于婷、楊子葳諸弟協助。投稿後，並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14年3月4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年5月13日。

**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¹ 葉文心、呂芳上和桑兵的幾部著作，闡述清末民初學生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係，不妨直接參考：Yeh Wen-hsin,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呂芳上, 《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年); 桑兵, 《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北京：三聯書店, 1995年); 桑兵, 《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年)。

² 2007年12月中旬，東海大學歷史學系、中正文教基金會主辦「近代中國國家的型塑：領

代中國國家的型塑：領導人物與領導風格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本人提交論文〈「五四」前後的蔡元培與南北學界〉，闡述五四運動爆發以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從辭職到復職的曲折過程，說明當年隱於幕後的一群南方教育界要角：黃炎培、沈恩孚、袁希濤、蔣夢麟等人，是如何積極參與民初教育史上這戲劇性的一幕，顯示出江蘇省教育會對北大校長人選的影響力。³ 然而，該篇論文也引出一個更為複雜的課題，即江蘇省教育會在五四前後的全國性布局，及其領袖人物在五四期間所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惟這一連串問題異常複雜，絕非一、兩篇短文所能解答。關於江蘇省教育會在晚清民初歷史舞臺上的角色，早有專書、論文予以勾勒，⁴ 惟其中猶多待發之覆。至該會在五四運動期間所起的作用，則尚未出現令人滿意的論析，實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而五四運動的根本性質，也因此未獲得透澈的理解。本文擬在前一篇論文的基礎上，深入探究五四運動發展歷程中，江蘇省教育會是如何捲進這一場由學界蔓延到政治、外交層面的巨大風潮。基於這一課題的複雜性，本文擬集中探討江蘇省教育會在五四運動第一階段的活動，說明此輩在南北教育界的布局、策略及活動方式，欲為新的五四運動史研究揭開序幕。⁵

導人物與領導風格國際學術研討會」，最後一場次是圍繞學術史展開。桑兵、陳以愛、王信凱分別從不同角度檢視民初的「南北」問題，均不同程度修正了原有的論述框架，開啟另一種民國史研究的視野。三文均收入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

³ 陳以愛，〈「五四」前後的蔡元培與南北學界〉，收入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頁336-361。

⁴ 中文著作如：谷秀清，《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劉正偉，《督撫與士紳——江蘇教育近代化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此外，尚有學位論文：陳昫秀，〈清末的江蘇教育總會（1905-1911）〉（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Ernst P. Schwintzer, "Education to Save the Nation: Huang Yanpei an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Movement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Ph.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2).

⁵ 本文初稿曾在2009年5月2-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當時所訂題目是「五四運動期間江蘇省教育會的角色」。初稿發表之後，得見2009年出版的谷秀清《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該書第五章「江蘇省教育會的政治參與」，作者特闢「五四運動與江蘇省教育會」一節，「以1919年發生於北京而後波及到全國的五四運動為例，探討江蘇省教育會在本次風潮中的應對舉措，以及採取此種措施的原因和影響」。惟該書引用史料太少，亦未詳參一般五四研究論著，自難全面評述江蘇省教育會的角色。可參考谷秀清，《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

貳、袁希濤密電南下

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輯出版《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是一部珍貴的五四史料集，所收錄史料包括1919年5月12-29日教育部次長袁希濤發到南方的7通密電，發給上海林蔭路江蘇省教育會沈恩孚、黃炎培，以及教育部派往上海的僉事沈彭年。此外，1990年出版的《嚴修先生年譜》，據嚴氏日記提到1919年5月7日袁希濤致沈恩孚一通密電。因此，今所見五四時期袁希濤發往江蘇省教育會的密電，總共是8通。這8通袁電，肯定不是五四期間袁希濤發出的全部電文，且目前尚未得見黃、沈等覆電內容。可是，細按這8通袁電，已可獲悉若干重要訊息，使人明瞭江蘇省教育會以怎樣的方式參與了五四運動，在五四時期扮演怎樣的角​​色，起著怎樣的推動歷史演進的作用。

為了行文清晰起見，下面表列五四期間袁希濤發出的密電內文，它們透露出重要的政治訊息，顯示了南北之間互通款曲的情況。細按袁電內容，涉及多項議題，皆為五四時期聚焦所在，包括：

- 一、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地位的維持；
- 二、北京直轄各校長的留任；
- 三、學生罷課風潮的發展；
- 四、田應璜任教育總長案的撤銷；
- 五、懲辦曹、陸問題。

袁希濤密電不斷交代這些問題的最新動向，其到底懷著怎樣的意圖和動機？袁電對江蘇省教育會的行動產生什麼影響？江蘇省教育會的要角在五四期間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究》，頁209-227。

表1、袁希濤致江蘇省教育會密電一覽表（1919年5月7-29日）

日期	收電者	電文內容	資料出處
5月7日	沈恩孚	牽於五四風潮，恐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地位動搖，請嚴修速返北京維持。	《嚴修先生年譜》
5月12日	沈恩孚	9日，大學蔡校長辭職，逕行出京。直轄各校長，亦遂辭職。各校員生，紛起請留。情勢急切，部已派商耆〔按：沈彭年〕南來挽留。濤昨見首揆，頃謁元首，均囑部，速留蔡。倘蔡公抵滬，請先轉達。并希轉告菊生、夢麟兩公為荷。濤。文。	《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
5月13日	沈恩孚	文電計達。蔡公是否抵滬，請先略覆。北京直轄各校長，繼續辭職者，因留蔡未有結果，均尚未回校任事。各校學生代表，每日開會。現狀如此，深以多延時日，無法維持為慮。……請速覆。濤。元。	《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
5月15日	黃炎培	政府留蔡指令，已發表。直轄各校長，亦多允仍任職。蔡公已否過滬？倘對於挽留一節，遽仍表示決絕，則風潮難息。牽連教育大局，深可危慮。嚴範老已否北回？濤。咸。	《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
5月17日	沈彭年	前兩日直轄校長辭職者，均回校，大學秩序已漸回復。昨晚大學，又以政府所發命令不滿意，〔按：初稿下有「提出決難辦到之條件」句，定稿時刪去。〕約集各校，發生風潮，現已設法維持。但再生枝節，則無法處置矣。蔡公踪跡未得，如已托人在杭、紹物色，則公可即回京。……濤。篠。	《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
5月21日	黃炎培	今日政府已聲明撤回田教長之同意案。特密聞。〔按：初稿此句下有「以息學界反對風潮」語，定稿時刪去。〕濤。箇。	《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
5月23日	沈恩孚	自政府聲明撤回田某同意案後，學生復以懲辦曹、陸問題一致罷課。前、昨兩日，發生凌侮日人之事十餘起，多因講演而起。又因散布印刷品，發生交涉。將有不能維持之勢。至懲辦曹、陸問題，政府因各方面關係，於事實上亦不能照辦。學生此次要求目的，既難達到，而妨礙秩序之事實，又復迭生，則外省言論上之鼓吹，此時似宜相機注意，以免青年熱度沸騰，至不可收拾之地位。特此密告。……濤。梗。	《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
5月29日	黃炎培	勸電〔按：5月28日〕悉，前限3日上課，表面以部令督促，內容係由各校分別勸導。惟外省日有罷課電到，京校益難挽回，今日限滿，部中持冷靜態度，以息外間訛言。聞學生方面，已漸有請假回籍者。大學情形極複雜，日內子老來，恐亦難處理，爾和意見亦同，適之赴津，俟回與商，如尚有方法，當再電告。特此密復。濤。艷。	《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頁235-238、304-305；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先生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90年），1919年5月7日條下，頁415-416。

翻閱一般五四研究論著及北京大學校史，多未對此作出精確而清晰的說明。最早出版的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便誤以為6月10日袁希濤辭去教育次長一職，標誌著北京政府對學生的態度出現轉圜，從此開啟妥協之門，嚴重誤判袁希濤的角色。⁶ 其後彭明的《五四運動史》指出北京政府內部「不是鐵板一塊的，在他們之間，也充滿著矛盾。」⁷ 並根據《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所收袁希濤密電，認為袁電「反映了他的焦慮心情」，⁸ 可惜彭明未能進一步追查袁希濤的背景，揭示袁氏與江蘇省教育會的淵源。梁柱的《蔡元培與北京大學》一書，更誤以為袁希濤電文是「軍閥政府」「玩弄陰謀」的表現，「企圖以暫時挽蔡來平息學生運動」，⁹ 可見未諳徐世昌政府人事結構的複雜性，更未參考1984年出版的彭明《五四運動史》，才出現這樣的失誤。

但在中國近代教育史的論著中，早有研究者指出袁希濤與江蘇省教育會的密切關係。呂芳上在1994年11月臺灣舉辦的「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發表〈「學閥」乎？「黨化」乎？——民國十四年的東南大學學潮〉，即直指袁希濤為江蘇省教育會的中堅分子。¹⁰ 2001年劉正偉的《督撫與士紳——江蘇教育近代化研究》，也清楚揭示袁希濤與江蘇省教育會的關係，認定袁氏是江蘇省教育會的核心人物之一。¹¹ 研究北京大學歷史的林輝鋒在2007年《學術研究》第11期發表的〈「五四」運動中的「留蔡助蔣」再探〉，也指出袁希濤為江蘇省教育會的要角。¹² 本人在2007年12月臺灣舉辦的「近代中國國家的型塑：領導人物與領導風格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五四」前後的蔡元培與南北學界〉一文中，復進一步闡述袁希濤與江蘇省教育會的關係。可惜政治史和教育史研究

⁶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58-159.

⁷ 彭明，《五四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89-290。

⁸ 彭明，《五四運動史》，頁302。

⁹ 梁柱，《蔡元培與北京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59。

¹⁰ 呂芳上，〈「學閥」乎？「黨化」乎？——民國十四年的東南大學學潮〉，收入氏著，《民國史論》，中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850。

¹¹ 劉正偉，《督撫與士紳——江蘇教育近代化研究》，頁294-298、313-356。劉書論述詳實，是一部值得參考的論著。

¹² 林輝鋒，〈「五四」運動中的「留蔡助蔣」再探〉，《學術研究》，2007年第11期（2007年11月），頁103-109。另參見林輝鋒，《馬敘倫與民國教育界》（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88-92。

者鮮少交流，竟使袁希濤在五四期間所發揮的作用，迄今未獲清楚的認識。¹³

概括地說，袁希濤是江蘇省教育會的要角，是該會的南北布局中，安置在北京教育部的實力派人物。袁氏擔任教育部次長期間，江蘇省教育會的勢力得到可觀的拓展。就在這一時候，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有可能動搖江蘇省教育會的全盤布局。五四運動發生之後，校長蔡元培和教育總長傅增湘都承受了極為沉重的外界壓力。5月9日，蔡元培忽然辭職出京，去向未明。5月11日，同情蔡元培的傅增湘有感於「調停無術」，亦不得不「避賢而遠引」。¹⁴ 這個時候，袁希濤既須抵制安福系染指教育部的企圖，又得安撫及調解北京各校校長相繼辭去的危局。一旦處理不當，江蘇省教育會多年的苦心經營很可能遭受嚴重破壞，1919年5月4日後袁電頻頻南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叁、發動「挽蔡」輿論及行動 (1919年5月9—20日)

從袁希濤的密電看來，蔡去傅退之際，「挽蔡」是江蘇省教育會制定的首要策略，分別由袁希濤和黃炎培、沈恩孚在南北努力。北京方面，袁希濤的任務主要有3項：一、探詢大總統徐世昌和總理錢能訓對蔡元培留任的態度；二、派人查訪蔡元培的下落，設法勸其回任；三、安撫及勸說北京各高校校長回任。上海方面，黃炎培和沈恩孚的工作有兩方面：一、在南方探查蔡元培下落，勸其回任；二、運用江蘇省教育會及上海各界的力量，組織性地製造輿論及喚起輿論，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留蔡挽傅。前引袁希濤打給黃炎培、沈恩孚的8通密電，便聚焦於上述策略。至於具體的執行方式有二：一、面對面的勸說和安撫。運用私

¹³ 2009年5月北京「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馬勇發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以「挽留蔡元培」為中心〉，對袁希濤的角色略有論述。馬文隨後發表於《史林》，2009年第6期（2009年12月），頁110-119。

¹⁴ 傅增湘，〈藏園居士六十自述〉，收入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卷19-20（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351。

人情誼，分析利害，說動蔡元培及北京各高校校長答應留任。¹⁵ 二、從上海發動大規模輿論壓力，向北京政府表達「挽蔡」的強烈要求。就後一方面，5月23日袁希濤密電中所謂「外省言論上之鼓吹」，便透露出這項重要訊息，顯示江蘇省教育會向北京政府抗爭的手段。換言之，若欲瞭解五四時期江蘇省教育會的「挽蔡」努力，不能不考察上海地區的報章輿論是如何被製造及發動起來的。

今按五四運動發生後，解散北京大學的傳聞，即時見諸報端。5月7日北京《晨報》報導：

自學界風潮發生以來，昨日忽有一種駭人聽聞之風說，謂政府外之某人曾向當局提議：應解散北京大學。……據記者調查此說，確非無因。¹⁶

上海報章對北大解散的報導，甚至還早於《京報》。5月6日上海《申報》載「平和通信社」5日電：

北京電：昨錢能訓宅會議，主張解散北京大學。傅增湘力爭，今已遞辭呈。各校停課，公舉代表，請求教育部釋放學生。¹⁷

5月6日上海《時事新報》的報導更駭人聽聞：

章宗祥死，學生擬死刑，大學解散。¹⁸

同日《民國日報》的報導也不遑多讓，刊載5、6兩日北京急電：

大學校長蔡元培辭職，願以一人抵罪。……
北京大學已下令解散。

¹⁵ 這方面的論述，詳參陳以愛，〈「五四」前後的蔡元培與南北學界〉，收入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頁336-361。

¹⁶ 〈異哉！解散北京大學之風傳〉，《晨報》，上海，1919年5月7日，版2。

¹⁷ 1919年5月6日上海《申報》引「平和通信社」5日電。

¹⁸ 〈北京專電〉，《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5月6日，第1張版1。「章宗祥死」是誤傳。

被補各學生擬處死刑。¹⁹

除了京、滬各報的報導外，江蘇省教育會更收到教育部袁希濤的密電。《嚴修日記》1919年5月7日條下，記述北洋教育名宿嚴修甫從鎮江抵達滬上，江蘇省教育會沈恩孚便登門拜訪：

是日午後沈信卿來，以所接教育部袁次長電報見示。袁次長因本月4日北京學生風潮，恐大學校長蔡子民君地位有搖動，欲余速到北京維持。余託信卿代為電復，言蔡君似不至搖動，余一時不能到京。信卿談極久。²⁰

5月7日午後沈恩孚所示袁希濤電文，或者發於更早時候。沈造訪嚴，是因嚴修為北洋教育名宿，與大總統徐世昌是多年舊交，在朝在野聲望極隆，故袁希濤託沈恩孚敦請嚴修北上維持，但嚴修一時無法北上。兩人談論「極久」，可證教育會要角對北方局面的關切程度。

沈恩孚造訪嚴修的前一天（5月6日）下午，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召集上海各學校校長，齊集林蔭路江蘇省教育會會址，籌商國民大會的召開辦法。²¹黃炎培在會議上報告及議決事項之一，包括：

電政府力爭日本交涉，對於北京學生事件，不得加以死刑，并不得解散大學。此電護軍使已允代達。²²

江蘇省教育會對日本問題的看法，在此先不敘述，將另文探討。就該會對北方教育界的立場而言，黃炎培提到的電文，隨即分送上海《申報》及《民國日報》等報發表，在5月7日刊出，意在喚起全國各界的注意。這通致北京府院部電文呼籲：

¹⁹ 〈本社專電〉，《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5月6日，版2。

²⁰ 《嚴修日記》編輯委員會編，《嚴修日記》，第4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1919年5月7日條下，頁2260上。

²¹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黃炎培日記》，第3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年），頁62。陳曾熹的上海五四運動史專著，也特別注意到江蘇省教育會的動員力量。

²² 〈國民大會籌備紀事〉，《申報》，上海，1919年5月7日，版10。

報載學生為外交公憤鬪爭，警廳捕學生，擬處死刑，並解散大學等語，學界駭詫。無論學生舉動如何，總發於愛國熱誠，即使一時憤激，軼出範圍，決無死罪。況此係私人行為，尤不當因此破壞全國唯一之最高教育機關，務乞大總統、大總理、總長審慎主持，免致激怒全國，國家幸甚。江蘇省教育會。麻。²³

5月7日上海《申報》更大篇幅匯集各界及社會團體反對「解散大學」的電文，給予醒目標題：「籲請慎處學生維持大學電」。²⁴ 當天《申報》的「時評」以「解散大學之無識」為題，以同情學生的筆調大聲疾呼：

此次北京之事，決非發始者之本意，政府中人苟能平心靜氣以處置之，斷不至因一時之激觸而有解散大學、以軍法處置學生之說。²⁵

細按《申報》的版面安排，顯然欲製造各界共同「挽蔡」的輿論圖象，此即袁希濤電文中所謂「外省言論上之鼓吹」，想藉此影響北京政府的決策。

綜觀五四時期上海《申報》對各界電文的刊載方式，更可以看出編者確實有意組織及發動一場全國性輿論。像這樣的政治運作手段，是現代新聞業傳入後配合電報通訊的技術，使得政治鬥爭以嶄新的形式呈現在人們眼前。²⁶ 辛亥革命的迅速蔓延南方，從某一個角度來看，即是現代新聞媒體展現其力量的最佳例子。²⁷ 及至五四時期，中國新聞媒體發動及製造全國性輿論的表現，一時令外國駐華官員留下深刻印象。美國駐華大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回憶錄第三十二章「全國罷工和團結」，就發出這樣的驚嘆：

²³ 〈省教育會電〉，《申報》，上海，1919年5月7日，版10；Joseph T. 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The Making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Leiden: E.J.Brill, 1971), pp. 76-78.

²⁴ 〈籲請慎處學生維持大學電〉，《申報》，上海，1919年5月7日，版10。

²⁵ 冷，〈解散大學之無識〉，《申報》，上海，1919年5月7日，版3。

²⁶ 張謇等東南人士從清末就注意掌握媒體製造輿論。可參章開沅，〈張湯交誼與辛亥革命〉，收入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729-734。

²⁷ 辛亥以後，即有「清之亡，實亡於報館」的時論。〈陶湘致盛宣懷函〉（1912年4月17日），收入陳旭麓等主編，《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頁340。

從這個空前普遍的運動中發現了下列幾件重要的事實：第一，必須這樣喚起輿論，使之成為一種持續起作用的力量；必須這樣組織輿論，使之一直具有表達它的意志的手段。……法國公使波勃說：「我們正面臨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最令人驚異的事情，那就是中國為了積極行動組織了一種全國性的輿論。」²⁸

上海正是中國新聞業的中心，也是全國輿論形成的中心。《申報》等重要報刊在五四時期的表現，實是一種政治參與的形式，背後有人為組織及特定政治目的。

依據報人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記載，五四時期的《申報》社長史量才，本是清末頻繁出入《時報》館「息樓」的人物之一，與黃炎培、沈恩孚、袁希濤「三舉人」私交甚篤。黃炎培的〈史量才先生之生平〉一文，更透露史氏與江蘇省教育會的深厚淵源：

光緒三十一年，〔史量才〕借諸同志發起江蘇學務總會……。²⁹

江蘇學務總會即江蘇省教育會之前身，足見史量才與黃炎培等之密切關係。清末民初，史氏尚與黃炎培等參與江蘇地方許多的重要建設，被黃炎培譽為同輩中之佼佼者。³⁰ 史氏在這一群人中，特別深悉現代新聞業的重要性，³¹ 在張謇、趙鳳昌的支持下，又獲得黃炎培、沈恩孚的鼓勵，於1913年接辦上海《申報》。³² 如包天笑所說的，史氏接辦《申報》，根本是「江蘇諸元老」的「合謀」。此後，史氏對《申報》「經營慘淡，二十餘年，未嘗少懈，實為一生心血之所凝

²⁸ 保羅·S·芮恩施 (Paul S. Reinsch) 著，李抱宏、盛震溯譯，《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1913-1919年美國駐華公使回憶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285。

²⁹ 黃炎培，〈史量才先生之生平〉，《人文月刊》，第5卷第10期（1934年12月），頁1。

³⁰ 黃炎培指出：「惟時人才雲集，而思慮之銳敏，治理之精覈，獨推先生」。黃炎培，〈史量才先生之生平〉，頁1。

³¹ 黃炎培，〈史量才先生之生平〉，頁1。

³² 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上冊（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423、529。史量才與黃炎培交誼深厚，外界傳說史氏在1934年被刺而死，與黃、史交誼有關。倪波等，《江蘇報刊編輯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83-384。黃炎培自傳證實了這一傳聞。參見黃炎培，《八十年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頁93-94。近年刊行的《黃炎培日記》，也極多黃、史交往的紀錄。

結。」³³ 誠如論者指出，「史量才本人可以說是江蘇教育總會的嫡系」。³⁴ 瞭解到史量才與江蘇省教育會的關係，便可以瞭解五四時期的《申報》輿論，實反映著江蘇省教育會的特定觀點。細按《申報》對五四運動的報導，可以略知此輩是如何透過報紙引導社會輿論，進一步影響政局動向。五四運動發生之後，《申報》密集登載反對解散大學、要求釋放學生的電文。隨後北京政府宣布釋放學生，大學照常上課，其中固有熊希齡等北方名流的保釋、教育總長傅增湘拒絕連署解散大學令的原因，³⁵ 但滬上輿論積極響應學生運動，未嘗不是促成北京政府讓步的一個原因。³⁶

然而到了5月9日，蔡元培校長得悉安福系決定撤換大學校長的消息之後，自行決定辭職出京，且不知去向。這時，袁希濤所擔心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地位動搖」一事，果真發生了。緊接著北京直轄各校長相繼辭職，京中教育頓時有全面動搖之象。5月12日袁希濤急電江蘇省教育會，說明5月11日謁見徐世昌大總統、錢能訓國務總理之時，兩人同聲指示「速留蔡」。同日，江蘇省教育會便作出迅速反應，連同浙江省教育會共同通電北京院部表達意見：

聞大學蔡校長辭職，學界恐怖。學問獨立，世界公認，茲因他事牽涉大學，學術摧殘，何以立國？群情憤激，後患喪虞。乞竭力挽留，以保吾國學術一線光明。³⁷

明確表達挽蔡。同日，剛剛成立（5月11日成立）的上海學生聯合會（以下簡稱上海學聯），也致電北京教育部發出挽蔡宣示，其口吻則較為激烈：

報載政府將撤換大學校長，蔡先生出走，聞之駭憤。蔡先生學界泰斗，自長大學，全國交慶得人，今犯何罪，欲加撤換？務望毅力主持，毋使

³³ 黃炎培，〈史量才先生之生平〉，頁1。

³⁴ 陳昫秀，〈清末的江蘇教育總會（1905-1911）〉，頁59。

³⁵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 128.

³⁶ 5月9日上海《時事新報》報導：「本埠省教育會得教育次長袁觀瀾來電（八日下午七時到），亦云學生開釋，各校照常開課云云。」〈北京專電〉，《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5月9日，第1張版1。

³⁷ 〈挽留北京大學校長電〉，《申報》，上海，1919年5月13日，版10。

奸人得逞，否則全國青年將起為大學學生後盾。³⁸

江蘇省教育會和上海學聯的電文，同日刊諸上海報章，展現了滬上學界的共同立場。³⁹

今從《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收錄的袁希濤密電可知，5月12日江蘇省教育會及上海學聯的挽蔡電文發出後，袁希濤得知徐世昌、錢能訓慰留蔡元培的態度，隨即於5月13日致江蘇省教育廳廳長胡家祺的密電中透露：

至挽留蔡校長事，……政府并已辦有挽留指令。惟傅總長離部未回，未副署。⁴⁰

5月13日下午北京各校代表也獲得國務院消息，知道徐世昌大總統決定慰留蔡元培。「指令刻已擬定，即時可以送府蓋印，至遲明日可在政府公報發表。」⁴¹但滬上一時未悉北京動向，依然竭力發動「挽蔡」的輿論。

5月15日，上海學聯再接再厲，發布對北京政府的第二次宣言，末段聲明：

今與政府約，請自今日始，於一星期，作正當明確之表示，維持蔡校長之地位，與大學之尊嚴。……若滿一星期，猶無滿意之表示，則誓籌最後之對付。⁴²

這段宣言立即遍登上海報章。同一天，江蘇省教育會也致電北京院部，內容呼應上海學聯的宣言：

文〔十二日〕電計達。蔡校長辭職，迄未見明令挽留，學界異常憤激。上海學聯寒日〔十四日〕宣言：一星期內，政府不能表示維持蔡校長地位與大學尊嚴，誓籌最後對付等語。潮流所激，前途將不堪設想。除由

³⁸ 〈學生聯合會電〉，《申報》，上海，1919年5月13日，版10。

³⁹ 1919年5月13日上海《民國日報》就同時刊出兩電，冠以〈挽留蔡校長之公意〉的標題，版10。

⁴⁰ 袁希濤，〈致胡家祺密電稿〉（1919年5月13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頁235-236。

⁴¹ 〈黑暗勢力與教育界全體搏戰〉，《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5月16日，版6。

⁴² 〈學生聯合會第二次宣言〉，《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5月15日，版10。

本會盡力勸導外，懇速頒明令維持，以慰眾望。江蘇省教育會。咸。⁴³

江蘇省教育會與上海學聯兩次發布電報及宣言，頗有唱雙簧的味道，既加強對北京政府施加壓力，也帶動上海乃至全國挽蔡輿論。

深悉內情的江蘇省教育會之所以繼續呼籲挽蔡，一方面在對外宣示其挽蔡的堅定立場，一方面也是繼續向北京政府施壓，免其中途變卦。前引5月14-15日上海學聯宣言及江蘇省教育會電報發出後，5月15日黃炎培接北京袁希濤密電：「政府留蔡指令，已發表。直轄各校長，亦多允仍任職。」⁴⁴ 這一消息說明江蘇省教育會等南北同人所作的努力，已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讓步。此時，袁希濤卻為另一件事憂心不已，此即他在15日致黃炎培密電中表示的「蔡公已否過滬？倘對於慰留一節，遽仍表示決絕，則風潮難息。牽連教育大局，深可危慮。」⁴⁵ 換句話說，蔡元培的動向是他們無法掌握的部分，卻可能牽連江蘇省教育會的北方布局。

蔡元培行蹤不明之際，5月14日從北京南下勸說蔡元培回任的京、津學生代表抵達滬上。5月16日江蘇省教育會出面約請上海中等以上各校校長，會同袁希濤派遣南下挽蔡的教育部代表沈彭年（商耆），召開一次南北學界大會師的盛會。5月17日《申報》、《時事新報》報導這次會議情形：

昨日江蘇省教育會聞京津學生聯合會代表團蒞滬，爰招集本埠各中等學校以上各校長，於下午三時後開茶話會，特邀教育部僉事沈商耆君暨京津學生聯合會代表團與會，籌商挽留北京大學校長蔡子民先生辦法。首由主席副會長黃任之君說明開會宗旨。旋請沈僉事述教育部挽留蔡先生情形。次由北京大學學生代表方豪君詳述此次北京學生五月四日示威運動經過情形，後乃說明代表團南下之任務：一、挽留蔡校長回校；二、接洽南方學界；三、籌議抵制日貨。乃由主席請與會人員各抒意見，商議辦法，遂決定：一、由會備函挽留蔡子民先生；二、由會推舉代表赴

⁴³ 〈關於挽留蔡校長之消息〉，《申報》，上海，1919年5月17日，版10。

⁴⁴ 袁希濤，〈致黃炎培密電稿〉（1919年5月15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頁236。

⁴⁵ 袁希濤，〈致黃炎培密電稿〉（1919年5月15日），《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頁236。

本埠學生聯合會，通知得悉政府慰留蔡校長之命不日可下，罷課事可取消。三、中等學校以上學生利用暑假組織講演團赴各地勸導人民抵制日貨。最後由主席聲明：本埠學界對於此次北京學界之義舉深表同情，願〔願〕以一致的主張、持久的精神，相與勉勵云。至五時半散會。⁴⁶

5月16日由黃炎培主持的這次茶會，展現出江蘇省教育會領導全國教育界的自信及聲望。⁴⁷ 按這次南北大會師的集會上，參加者有北京教育部代表、京津學生聯合會代表團、上海各中等以上學校校長，再加上東道主江蘇省教育會，確是民國成立以來一次難得的學界盛會。考慮到1919年南北由對立而議和的時代背景，這一次盛會就更加引人矚目了。而黃炎培作為茶會主席，無疑凸顯其領袖群倫的地位和能力。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南北學界會師的集會中，卻不見上海學聯代表的身影，其中原因耐人尋思。

上海學聯代表的缺席，隱約透露出省教育會與學聯的微妙關係。不管是黃炎培未嘗邀請上海學聯代表出席，又或是學聯代表不願意參加茶會，都顯示出江蘇省教育會與上海學聯的不同調。愈到五四運動後期，這種「不同調」就愈為明顯，讓上海的五四運動添加了複雜元素。而從上文提及這次會議的議決之一：「由會推舉代表赴本埠學生聯合會，通知得悉政府慰留蔡校長之命不日可下，罷課事可取消」一句話，在在說明：一、黃炎培等人最關心的是「挽蔡」。一旦北京政府同意挽留蔡元培，黃炎培等認定上海學生即無罷課之必要。二、黃炎培等人以為，江蘇省教育會派代表向上海學聯解釋後，學生應可同意取消罷課，孰料事情的後續發展卻不在他們預料之中，這要留待另文再行交代。

另外，上面提到的5月16日南北學界會議展現出江蘇省教育會領導全國教育界的威望，還可以從5月18日遍登上海各報的一封公開信看出。信函由江蘇省教育會署名，最末註明「代表教育界同人」。內文如下：

子民先生賜鑒：敬啟者，自公辭職離京，教育界同人，遍訪行蹤，不獲消息。部轄各學校校長，遂相繼辭職，學生全體罷課。各處復分電政

⁴⁶ 〈關於挽留蔡校長之消息〉，《申報》，上海，1919年5月17日，版10。

⁴⁷ 5月16日，全國報界聯合會另開會歡迎京津及留日學生代表。〈報界歡迎學生代表團〉，《申報》，上海，1919年5月18日，版10。

府，請明令挽留，並維持大學。現挽留明令，業已頒發，各校長亦允暫任職，惟仍以公一人之去留為去留。公果堅辭，則教育界必發生絕大危險，亦此學術一線曙光，亦將絕滅。國家前途，更復何堪設想。敝會特代表教育同人，掬忱懇請我公顧念教育前途之重要，迅即回京任職，以慰眾望。敝會因至今未得公出京後確實消息，特將此函送登各報，務希鑒此愚忱，慨允復職，並即賜復為幸。專此敬請道安。江蘇省教育會代表教育界同人謹啟。五月十八日。⁴⁸

這封致蔡元培的公開信，無疑是5月16日會議上議決的「由會備函挽留蔡子民先生」的行動化。是函除了表達「挽蔡」的誠意之外，兩度聲明「江蘇省教育會代表教育界同人」。耐人尋味的是，5月18日公開信在上海《民國日報》刊出，最末僅作：「江蘇省教育會同人謹啟」，被刪去了「代表教育界同人」7個字。⁴⁹再檢該年5月31日《民國日報》刊出〈告江蘇省教育會〉一文，則嚴詞批評江蘇省教育會，警告其「此後幸勿越俎妄為」，「苟尚有良心者，可用公等私人名義」云云。其中所言雖係他事，卻不難窺知國民黨人對江蘇省教育會聲明「代表教育界」之不滿。⁵⁰

若把五四時期上海《申報》和《民國日報》的言論作比較，還可以看出這兩份報章立場不同。這應與《民國日報》由國民黨人邵力子、葉楚傖主持，對北京政府懷抱強烈敵意有關。⁵¹邵力子等人對五四運動的報導，以及對學生運動的支持，據說有來自孫中山的指示。⁵²按《民國日報》編者對5月12-17日教育局勢的報導，都冠上〈黑暗勢力與教育界全體搏戰〉的聳動標題，詳細刊載北京各界挽蔡行動及電文，確實有煽動輿情的意圖。相較之下，《申報》的報導溫和許多，反映江蘇省教育會的不同態度，也呼應上海市民重視秩序的社會心理。黃炎培在

⁴⁸ 〈挽留蔡校長之函稿〉，《申報》，上海，1919年5月18日，版10。

⁴⁹ 此外，《民國日報》誤植信函日期為「五月十九日」。〈懇請蔡子民先生回校〉，《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5月18日，版10。

⁵⁰ 孫鏡亞，〈告江蘇省教育會〉，《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5月31日，版12。

⁵¹ 國民黨人對五四學生運動的態度及他們涉入這場運動的方式，參考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頁24-40。

⁵²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1919年5月6日條下，頁1172-1173。

清末雖然隸籍同盟會，與邵力子復屬南洋特班生同學，同樣師事蔡元培。惟辛亥至五四時期，黃炎培與邵力子、葉楚傖等關係疏遠，在對待北京政府的立場上也有激進與溫和之區別。五四時期，葉楚傖、邵力子等藉《民國日報》大力鼓動學生罷課，與《申報》立場大相逕庭。但就「挽蔡」一事而論，滬上報章態度大體一致，對北洋政府都大表不滿。

話說回頭，5月18日江蘇省教育會「挽蔡」信函遍登上海報章之際，接下來攸關大局的事，即袁希濤密電至為關切的：「蔡公已否過滬？倘對於挽留一節，遽仍表示決絕，則風潮難息。」的確，上海學界能否尋得蔡元培，成功勸說蔡氏復職，是接下來人人關心的議題。

5月16日上海《民國日報》刊載一則〈蔡子民先生來滬說〉，報導指出：

茲從某方面探得消息云，蔡先生已於昨日抵滬，惟寓處未悉。上海學界聞之，急欲一見，四出尋覓探訪，迄未得其住址。⁵³

根據蔡元培日記，蔡元培是翌日才抵達滬上。蔡氏日記1919年5月17日條下記述：

夜抵上海，寓法租界天主堂街密采里旅館Hotel de France。⁵⁴

可見《民國日報》的消息不甚靈通，與蔡氏關係不很密近，惟編者對蔡元培的尊敬之情似出真誠。蔡元培抵達上海當天，《民國日報》刊出徐世昌挽蔡元培指令，特別加上一段按語：

按此令無一語慰勞勸勉，亦無一語根據全體學生之願望。所謂挽留蔡校長之命令，蓋如此如此，未知蔡校長能否為之屈留，一般學生又能否因之滿意也。⁵⁵

這樣的按語無疑有煽動人心的嫌疑。不過，按語提到政府挽蔡令已下，若蔡元培

⁵³ 〈蔡子民先生來滬說〉，《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5月16日，版10。

⁵⁴ 蔡元培，《日記》，收入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16卷，頁71。

⁵⁵ 〈請看徐世昌之命令〉，《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5月17日，版6。

不肯回任，教育大局將有崩壞的危險，倒非危言聳聽之論。

5月18日，即江蘇省教育會「代表教育界同人」挽蔡公開信遍登滬上報章當天，蔡元培日記中記述：

午前，蔣夢麟、黃任之、沈信卿、趙厚生來，商發一電於總統、總理、教育總長。⁵⁶

蔡元培日記之記事簡略，到底蔣夢麟、黃炎培等人是如何訪得蔡氏行蹤？抑蔡元培看到公開信之後，主動邀約蔣、黃等人見面？5月17日蔡氏日記的一段紀錄，留下一點線索：

午後一時，到浦口，渡江到南京。三時登車，晤沈步洲、……趙厚生……。夜抵上海。⁵⁷

趙厚生與蔣夢麟、黃炎培等人熟悉，可以推想蔡、趙同車抵達上海後，江蘇省教育會很快得悉蔡氏下榻住址。5月18日蔡元培與蔣、黃、沈、趙等見面時，商議如何回應北京政府及日益擴大的學潮。最後，蔡元培日記中提到的發總統、國務總理、教育總長電報，即5月18日發出同意有條件復職的電文，⁵⁸ 該電由蔣夢麟親手打出。⁵⁹ 5月19日上海《申報》刊登蔡氏復職電文，並簡要說明蔡氏回心轉意的原委：

北京大學蔡子民先生出走後，全國教育界震駭，四出尋覓行蹤。昨日，知蔡先生業已蒞滬，經滬教育界多方勸駕，請以全國教育為重，意已稍轉。⁶⁰

⁵⁶ 蔡元培，《日記》，頁72。

⁵⁷ 蔡元培，《日記》，頁71。

⁵⁸ 〈蔡元培自滬至京電〉，《申報》，上海，1919年5月19日，版10。高平叔等編注的《蔡元培書信集》，誤繫蔡元培電於5月20日。高平叔等編注，《蔡元培書信集》，上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415。

⁵⁹ 蔣夢麟，〈致胡適函〉（1919年5月24日），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9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頁417。

⁶⁰ 〈蔡元培自滬致京電〉，版10。

所謂「滬教育界多方勸駕」，指在黃炎培等人「以全國教育為重」的勸說下，蔡元培終於心意稍轉，同意在北京政府「曲諒學生愛國愚誠，寬其既往」的條件下，回任北京大學校長。⁶¹ 蔡電發出後兩天（5月20日），國務院及教育部袁希濤分別回電，表示歡迎蔡氏復職。⁶²

總括「挽蔡」一役，從5月9日蔡元培辭職到5月18日抵達滬上，蔡元培都從未表示願意回任，更盡量避免與教育界人士接觸。這樣拖延下去，北京教育大局確實有崩壞的危險。5月18日黃炎培、沈恩孚、蔣夢麟等人與蔡元培的面商討論，乃是促成蔡元培回任的關鍵。蔡元培與黃炎培、蔣夢麟交誼深厚，素有師生之誼，復共同參與清末革命。⁶³ 今按蔡元培從辭職到回任的過程中，南方的黃、蔣，北方的湯（爾和）、馬（敘倫），都出過大力，是蔡元培信賴及倚重的對象，這與彼此都參加過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大有關係。⁶⁴ 再加上五四前後江蘇省教育會的龐大勢力，儼然已成為全國教育界的龍頭，足以抗衡北京教育部。黃炎培、沈恩孚等在辛亥前後的政治參與，也使他們熟稔與北京政府周旋之法。蔡元培與他們熟商對策，毋寧是符合情理的舉動。更何況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即以江蘇省教育會的支持為背景，雙方在教育問題上頗有默契。在黃、蔣的大力勸說下，蔡元培同意有條件復職。他們的共識是：「及早恢復教育界原有狀況」。這個時候，北京及上海學生的罷課之舉，反倒是令他們憂心不已的局面。

蔡元培同意回任的消息傳出後，5月19日上海《時事新報》記載《京報》記者對袁希濤的訪談。袁氏在這次訪談中，公開表達「挽蔡」誠意，同時提及他對罷課的憂慮：

蔡君自此次風潮發生以來，連日奔走，十分勞頓。出京以後，當稍事休息，故即刻請其回京，恐做不到。但果校內秩序如常，學生依舊上課，

⁶¹ 〈蔡元培自滬致京電〉，版10。

⁶² 〈院部復蔡元培電〉，《申報》，上海，1919年5月22日，版11。

⁶³ 蔣夢麟，《西潮》（香港：磨劍堂，1960年），頁83-86。

⁶⁴ 湯、馬參與革命的記述，參見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臺北：龍文出版社，1990年），頁15-35。黃、蔣、湯、馬在挽蔡中的角色，可參陳以愛，〈「五四」前後的蔡元培與南北學界〉，頁336-361；林輝鋒，〈「五四」運動中的「留蔡助蔣」再探〉，頁103-109；林輝鋒，《馬敘倫與民國教育界》，頁103-109。

則或有可請蔡君再來之希望。政府方面既已慰留蔡君，決不欲輕事更易，且亦甚難其人。外間所傳，絕非足信，部中亦決不主張。⁶⁵

袁希濤挽留蔡元培的誠意毋庸置疑。他在訪談中既是表達憂慮，也是藉此勸告學生。因為5月19日北京學生已經發動總罷課，其原因是蔡元培辭職不返、教育總長人選變動，並不滿政府對曹、陸、章的慰留態度。關於罷課問題及其後續發展，當時無人可以預卜，但袁希濤已感憂心忡忡，大有前途不知所屆的惶然。

綜括江蘇省教育會在挽蔡事件中的表現，反映了他們政治手腕的純熟。他們運用下列手段：一、通過京中密電，策動南北配合，制定先後策略，謀定後動，反應機敏。二、拍發電報，策動滬上輿論集體施壓，形成全國挽蔡聲浪。三、與新成立的上海學聯配合，一急攻一勸告，演出「唱雙簧」的挽蔡曲。四、扮演溝通及調停南北朝野的角色，善於利用時機，連絡各界人士，製造5月16日南北學界會師場面，凸顯出江蘇省教育會的全國性領導地位，並把挽蔡輿論推向最高峰。在挽蔡過程中，最大輸家是北京政府，最大贏家是江蘇省教育會。的確，該會同人在這一階段中，不但維持住蔡元培的校長地位，更巧妙地製造出其不畏強權、為民喉舌的形象，在實質上及名聲上均頗有收穫。

肆、留傅拒田——教育總長之爭 (1919年5月16—21日)

5月18日蔡元培同意復職之後，江蘇省教育會的下一步策略是要促成教育總長傅增湘回任。傅增湘逕行辭職出京之日，在5月11日下午。當天，次長袁希濤立即派部員赴天津挽留。⁶⁶ 不過，記者敏銳地發現教育部慰留辭職諸人中，「對於蔡校長則特別派員赴滬勸駕」，⁶⁷ 其態度較挽留傅總長似更積極。的確，檢視袁希濤發往上海的密電，5月15日之前未有一語涉及教育總長問題，其中原因頗

⁶⁵ 〈教育總長與各校〔長〕之去留〉，《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5月19日，第2張版1。

⁶⁶ 〈雨黯風淒之北京教育界〉，《晨報》，北京，1919年5月13日，版2。

⁶⁷ 〈雨黯風淒之北京教育界〉，版2。

費人尋思。不過，5月7日及15日的兩通袁電都詢及嚴修動向，可能是寄望嚴修返北調停局面，以緩和來自安福系的壓力。但傅增湘本人辭意甚堅，5月15日北京政府終於下令免去傅氏職務。這時候，誰將接任教育總長？頓時成為敏感話題。5月16日，政府傳出參議院副議長田應璜將出掌教育部的消息，⁶⁸ 京滬學界馬上作出迅速而強烈的反應。到底田應璜是何許人也？這一人事案為何引起軒然大波？江蘇省教育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

據上海《申報》報導，曾任山西大學堂監督的田應璜被提名為教育總長，是大總統徐世昌的主張。⁶⁹ 田應璜為北京安福俱樂部成員，被外界視為北方武治派段祺瑞的擁護者。⁷⁰ 因此，這一人事案提出，立即引發京滬學界的強烈抗議。5月18日北京《晨報》報導：

政府提出田應璜任教育總長業已決定，聞眾院決定於星期一投票，預計兩院均可通過。……又聞田任教育後，次長袁希濤可望仍就云云。

北京學界及各校學生昨日得此消息，復聯合集合，仍主張挽留傅總長及蔡校長，間接否認田氏為教育總長云。⁷¹

5月17日北京學界集會中，有人提出全體罷課之主張，5月18日北京《晨報》報導：

昨日學界忽又呈危險之現象，其原因由於傅總長、蔡校長至今尚未挽留返京，昨日學界全體又開會議，有主張全體罷課者，最後決定向政府提出嚴重條件數項，如政府不予正式答覆，則舉行罷課。其條件：一、切實挽留蔡校長；二、教育總長不與更動；三、准許學生自由集會；四、懲辦曹汝霖數項，大約今日或明日提出云云。⁷²

⁶⁸ 〈安福派最近之會議〉，《申報》，上海，1919年5月19日，版7。

⁶⁹ 〈安福派最近之會議〉，版7。

⁷⁰ 安福俱樂部的成立原委、性質、組成分子及政治活動，參見來新夏等，《北洋軍閥史》，上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534-547。其實，田應璜與閻錫山關係更為密切。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先生年譜》，頁410。

⁷¹ 〈新教育總長決定田應璜〉，《晨報》，北京，1919年5月18日，版2。

⁷² 〈醞釀中之學界大波瀾〉，《晨報》，北京，1919年5月18日，版2。

當時，北京各校教職員及學生在留傅、挽蔡、拒田等事上，大體立場一致，只是在手段方面，部分教職員對學生的罷課之議，抱審慎而遲疑的態度。

5月19日北京《晨報》傳出進一步消息，直指安福系對教育總長、次長、乃至各高校校長人選，有一一更換的打算。《晨報》指出：

政府徇安福部之要求，提出田應璜為教育總長一節，已兩紀前報。茲聞該案提出後，安福部日前開會，本議定於本星期二在眾議院投票，乃政府又聽各方面之言，皆以田氏資格不足為教育總長。果見任命，學界風潮有不可設想者。且國家歷年辛苦經營之教育，斷不宜如此徇一派之私利，而以教育為犧牲，故日昨當局對於此事大起遲疑之念。然案已提出，無可轉圜，不得已，遂以修正為經由，向眾議院撤回原案，安福部力持不可。其結果聞關於次長問題，兩方恐須經一番之磋商。原來安福部一派所擬之次長為黃雲鵬。黃氏對人則言，已必不就，並推薦吳文瀚充選。然已未俱樂部則對於黃、[吳]均不同意，謂須以已未派之陳某、黃某代之。此條件如不成立，則撤回之說仍不能打消。總之，自教育總長易人問題發生之後，教育界（指行政及學校學生各方面而言）陡呈杌隉不安之理象。昨日且盛傳安福部已內定以胡鈞為大學校長，及某某為某校某校校長者，此說果確，教育界真從茲多事矣。⁷³

依據《晨報》報導，則田應璜案提出之後，教育總長、教育次長、北京各校校長人選都將出現異動。而國會中抵制安福派的已未俱樂部，另擬有次長人選。其時小道傳聞甚多，卻都指向同一個方向：一旦田應璜出任總長，教育大局有全面翻動的危險。

北京學生為此醞釀更為激烈的罷課風潮。5月18日北京18校學生聯合會公決：5月19日學生全體總罷課。5月19日《晨報》報導：

昨據某方面消息，各校昨日復開聯合大會，由專門十八校公決19日一致罷課。……至其罷課之理由，各方傳說不一。綜厥大要，不外下列數

⁷³ 〈教育總長問題之波折〉，《晨報》，北京，1919年5月19日，版2。這則報導幾乎逐文照錄地轉載於1919年5月21日上海《民國日報》，標題作：「小田也配長教育麼」，版6。另1919年5月22日上海《時事新報》也全文轉載，標題為：〈安福系急圖教育部〉，第2張版1。

端：一、政府未表示山東問題不簽字之明決態度，無對外之決心。二、政府對於某某等極力稱許，對於傅、蔡諸公則相反，近且有離奇更換之主張，危及教育界之基礎。三、政府對於留東學生之被捕而不問，北京學生之呼號而不期，反下令禁止學生集會、言論及發行印刷品之自由。是以學生無可再忍，取罷課之手段代最後之要求及運動，且望全國一致贊助云云。⁷⁴

5月18日北京學生聯合會寫定〈罷課宣言〉及〈上大總統書〉，強烈表達挽蔡、留傅的要求：

教育總長傅公、大學校長蔡公，學問道德中外推重。近來教育界有發皇振勵之氣，皆分二公之賜。而傅公則無端免職，蔡公則被迫遠引，以致各校校長聯翩辭職。日內復盛傳政府將以品卑學陋之田應璜繼傅公之後，似此摧殘教育，國家之元氣可傷。⁷⁵

由於挽蔡、留傅及其他要求而發動的學生總罷課，對後續全國性學生運動有決定性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北京學界留傅、拒田的巨大聲浪中，《晨報》不斷推波助瀾。例如5月20日《晨報》引用中美通訊社的消息，刊登不利田應璜的報導，又指安福派將包攬教育：

中美通信社消息云：昨日學界之罷課行動，雖對外的關係，而對於田應璜之反感，亦其一端。前晚高等師範學校曾開緊急會議，以田應璜繼長教育問題，付之討論。因聞安福部欲統一全國教育，凡有反對彼系者，即加以摧殘。如北京大學之校長，已預定以被大學驅逐之胡鈞繼任，即為個人報復之計。又以田氏鴉片烟癮甚大，以長教育，尤不足以表率群倫。故今日各校一律罷課，因之而益堅其志。⁷⁶

同日《晨報》報導：一旦田氏就職，次長袁希濤去職為勢所必然：

⁷⁴ 〈北京學界罷課之大風潮〉，《晨報》，北京，1919年5月19日，版2。

⁷⁵ 〈學界風潮愈鬧愈大〉，《晨報》，北京，1919年5月20日，版2。

⁷⁶ 〈田應璜與學界〉，《晨報》，北京，1919年5月20日，版3。

教育總長尚未通過於兩院，而教育次長已紛紛擬定有人。昨報所紀代黃雲鵬、吳文瀚兩人外，聞已未俱樂部亦擬有人，即程克是也。總之，田氏若能通過，袁希濤無論如何必站不住耳。⁷⁷

袁希濤從1915年以來擔任教育次長一職；袁若去職，再加上蔡元培辭職，江蘇省教育會在北京頓失臺柱，其對教育大局的經營內局，將一下子退回長江流域。

瞭解到這樣的背景，再考察上海學界對田應璜案的反應，就可以有更深入的認識。5月16日，即傅增湘被免職的消息發布翌日，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即南洋公學）校長、江蘇省教育會前會長唐文治即致電徐世昌大總統，表達強烈留傅之意：

北京學潮，群情憤激。……上海學、商界全體激昂，恐釀不測之禍，祈速定辦法，明白宣布，並請速留傅部長、蔡校長。⁷⁸

兩天後，錢能訓總理專電回覆唐文治：

傅部長辭職，業經多次慰留，乃其意甚堅，且已出京遠引，部務未便久懸，不得已始允其請。蔡校長已有指令批留矣。⁷⁹

這表示留傅難以達成，挽蔡卻為政府確認之政策，看來政府已有更換教育總長的決心。

就社會團體來說，上海江蘇省教育會於5月18日發出留傅電文，是最先發難的滬上團體。5月18、19日報章刊出江、浙兩省教育會致府院電文：

傅總長主持教育，夙孚眾望。此次京校風潮，苦心周旋，幸免激動全國，所全尤大。頃聞免職，學界震駭，乞收回成命，以維人心。⁸⁰

⁷⁷ 〈又一個教育次長〉，《晨報》，北京，1919年5月20日，版3。

⁷⁸ 〈關於挽留蔡校長之消息〉，《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5月17日，版3；〈挽留北京大學校長文電〉，《新聞報》，上海，1919年5月17日，版3。

⁷⁹ 〈北廷對於罷課之官話〉，《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5月25日，版10。

⁸⁰ 〈省教育會請留傅總長電〉，《申報》，上海，1919年5月19日，版10；〈兩教育會電留傅增湘〉，《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5月19日，版10；《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5月19日，第3張版1。

5月20日上海學聯也發出致府院通電，措辭更為強硬：

讀前日照准教育總長傅增湘辭職命令，不勝駭異。查此次傅總長因學潮引咎辭職，係屬個人問題，政府不應聽其去職，望速收回成命，以慰眾望，否則全國學界，恐將群起反抗，政府不能辭其咎也。⁸¹

江蘇省教育會與上海學聯先後發出的通電，在5月17-20日遍登滬上報章，引領著全國輿論的方向。

不僅如此，上海學聯發出上述通電之際，同時發動學生總罷課，聲援北京學生的抗議行動。當時在罷課問題上，江蘇省教育會與上海學聯態度不同，在留傅問題上卻再度達成默契。5月21日江蘇省教育會發出致政府通電，呼應上海學聯前一天發出的通電：

自報載京校學生，為爭總長易人問題罷課後，輿情非常激昂，時滬校各生自行集議，誓與京校一致行動，本會再四勸止，但允暫緩三日，聽候明令。萬一各地踵起，不惟教育前途危險，恐全局因此瓦解……。本會前與浙教育會窺見動機，曾於巧日〔18日〕電達府院，特再瀝陳，迫切待命。江蘇省教育會。馬。⁸²

細按江蘇省教育會的馬電，他們特別凸顯「爭總長易人問題」的嚴重性。這是該會的一貫技巧，以「一次集中火力攻一點」的方式，意圖迫使北京政府在總長問題上讓步。

至江蘇省教育會要角蔣夢麟主編的《新教育》雜誌，更措詞尖銳地痛斥安福派，指其有心摧殘教育部。蔣夢麟的筆調辛辣：

某部某派，利用機會，欲將北京全體學生之舉動，加罪於北京大學。將新學勢力，根本推倒。教育部本為閑散之部，政客素不注意，待學生事出，始知青年學生，手無寸鐵，竟敢與赫赫大員宣戰，若不將教育部拿在手中，用其全力掃除新學，則真理昌明，魔鬼將無立足之地。力主公

⁸¹ 〈學生聯合會決議罷課〉，《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5月20日，版10。

⁸² 〈罷課聲中之省教育會電〉，《申報》，上海，1919年5月22日，版11。

道之傅總長，于是被逼出走，而某派某部，手舞足蹈，以為此後全國教育中樞，將為彼囊中之物。群小弄權，加禍于我山東聖地，猶以為未足，而必欲加禍于全國青年。……人心未死，必有以報諸公斷送聖地之鴻恩，摧殘教育之大惠也。⁸³

可見教育總長易人問題，深深刺激江蘇省教育會的神經。這次該會要角全員出動，有人進攻、有人防堵，竭力抵制安福系占據教育部的企圖。

5月21日江蘇省教育會發出致北京府院部電文之際，也致電南京江蘇督軍李純、江蘇省長齊耀琳，強調「總長易人」將導致嚴重後果：

自報載北京各校，為爭總長易人等問題罷課後，上海人心非常激昂。昨各校學生自行集議，誓與京校一致行動，決於明日起罷課。敝會同人將往力阻苦勸，僅允暫緩三日，如京校要求無效，一律實行。查學生罷課，不惟妨礙學業，且恐影響地方秩序。此時潮流所激，斷難強制，萬一各地方踵起，必至牽動全局。銷弭之計，惟在政府有俯順輿情之表示。務懇迅電中央，力陳危狀，迫切待命。江蘇省教育會。馬。⁸⁴

這通電文是欲借李、齊之力向北京政府施壓。觀上述電文同樣聚焦於「總長易人」，細心人不難從字裡行間體會到發電者用心之所在。

同日，江蘇省教育會的前後兩任會長唐文治、張謇，同時發出反對田應璜掌教育部之通電，為造成輿論壓力。唐電指出：

上海各校學生，紛紛集議，將隨京校一律罷課。經省教育會及各校長竭力勸阻，始各回校暫行上課，而激憤之心，益趨極點。查諸生疑慮要端，因京校學生案尚交法庭候訊，且總長易人，尤恐危及教育全局。現值和平會議尚未告成，可否緩提總長，以釋群疑。至京校候訊各生，萬懇諒其愛國熱忱，勿加苛責，事機迫切，乞賜電覆。唐文治。馬。⁸⁵

⁸³ 蔣夢麟，〈教育評論〉，《新教育》，第1卷第4期（1919年5月），轉引自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105。

⁸⁴ 〈抑制學生罷課電文〉，《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5月22日，版10；〈罷課聲中之省教育會電〉，《申報》，上海，1919年5月22日，版11。

⁸⁵ 〈唐文治請顧教育全局電〉，《申報》，上海，1919年5月22日，版11。

張謇發出的致大總統徐世昌電文，措辭更加尖銳強硬，表達他對青島問題與教育總長人選的看法。張電表達：

青島問題，舉國憤慨！報章揭露，事實瞭然。罪之所構，在軍人議員；而獄之所歸，在政府。……乞公訊電巴黎專使，嚴令決勿簽字。……

再教育總長已去職，報載將有安福派繼長教育之說。安福何派？派有何人？江海野人，無暇聞此。惟聞前此出錢收買議員，即此派人；則掃蕩國人之廉者，此派人也！扇播政爭之酷毒者，亦此派人也。若以此派人主持教育，豈將夷全國于牛馬襟裾之列乎？抑將薰學子以犬豕盲躁之臊也。全國學生正當盛氣之時，此令若頒，一波又起，未必諒政府之應酬黨派為不得已也。⁸⁶

張謇是清季民初教育界的重要人物，誠如五四時期北京師範學校校長陳寶泉所說：

清季負海內教育家之重望者，南曰張謇，北曰嚴〔修〕，此確論也。⁸⁷

北嚴南張，在全國教育界負有重望。惟張謇在清末民初政治界、實業界的影響力，遠非嚴修所能比擬。⁸⁸ 張謇、唐文治通電反對田應璜，直接點名痛斥安福派，對徐世昌政府造成輿論壓力，表明江蘇省教育會抵制安福派染指教育部的堅決態度。

5月22日北京《晨報》報導：5月21日下午錢能訓總理與北京22校校長談話時，針對學生上總統呈文6點逐一回應，在談及教育總長問題時，錢能訓表示：

蔡子民已允回京，國務院並有電催促之矣。傅〔增湘〕決不幹，田應璜之教育總長，政府決定收回提案，斷無投票之事，一時祇得由袁次長暫

⁸⁶ 〈張季直致北京政府電〉，《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5月25日，第1張版2；〈張謇最近之主張〉，《晨報》，北京，1919年5月27日，版2。

⁸⁷ 陳寶泉，〈嚴先生事略〉，收入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卷19（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236。

⁸⁸ 劉厚生，《張謇傳記》（香港：龍門書店影印，據1958年上海龍門聯合書局初版，1965年），頁175-184。

行代理。⁸⁹

蔡回田消，是錢能訓政府向輿論的一大讓步，田應璜案從此告一段落。此後雖微有波瀾，終究未讓田案通過。⁹⁰ 這一次撤銷田應璜任命案，可以視為江蘇省教育會的勝利。在其有效運作下，南北學界成功抵制安福系接掌教育部，並穩住蔡元培校長的地位，可見該會成員手腕之一斑。

5月21日，即錢能訓內閣撤回田案當天，袁希濤從北京密電報告上海黃炎培：

今日政府已聲明撤回田教長之同意案。持密聞。⁹¹

值得注意的是，5月29日上海《民國日報》的一則報導，隱約透露出袁希濤在拒田一案中的微妙角色：

聞袁氏從前反對田應璜長教育甚力，近頗覬覦總長一席。⁹²

細按田應璜案消息傳出後，京滬學界、報界傳聞極多，多謂教育大局將全盤翻動，似出於有心人煽動。到底袁希濤是否如《民國日報》所說「覬覦總長一席」，或許不無疑問；但袁氏「反對田應璜長教育甚力」，則不必懷疑。田案雖然撤回，錢能訓卻不願把袁希濤升任總長，5月30日上海《時事新報》報導：

教育總長一席，近有以袁希濤升任之說，當軸絕對否認。又因政府內部之關係，本問題暫時擱置。聞安福派方面亦有此種覺悟，不再以此為問題云。⁹³

江蘇省教育會及安福系這次的勢力拉鋸，暫時以袁希濤代理部務作結，等待下一

⁸⁹ 〈昨日二十二校長與錢總理談話情形〉，《晨報》，北京，1919年5月22日，版2。

⁹⁰ 例如5月24日上海《申報》報導：「田教長案，政府迭次欲撤回，眾院未允。（二十二日下午十鐘）」顯示田案仍有後續波折。《申報》，上海，1919年5月24日，版4。

⁹¹ 「袁希濤轉告撤回任命田應璜同意案密電」（1919年5月21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頁237。

⁹² 〈袁希濤想做總長〉，《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5月29日，版6。

⁹³ 〈京學界罷課後之趨勢〉，《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5月30日，第2張版1。

場風暴來臨。

總括5月16-21日「留傅拒田」一役，北方安福系與南方江蘇省教育會短兵相接，電報競出，是五四期間十分精采的一幕。就安福系來看，他們提名田應璜出任教育總長，想改變教育部長期由江蘇省教育會掌控的模式，不料鎩羽而歸。就江蘇省教育會來看，他們經過苦心經營，終於把勢力拓展到北方，自然不甘心把教育大權拱手讓與安福系。於是，5月9日以後陸續上演挽蔡、留傅、拒田的連場好戲。尤其拒田一役，唐文治、張謇兩位大老披掛上陣，策動輿論呼應，迫使北京政府不敢任命田應璜為總長。乍看之下，這一幕南北對峙及角力，以江蘇省教育會獲得勝利告終。不過，該會以上駟對下駟，王牌盡出，卻也使北京政府提高警覺，恐不能算全面贏得這場戰事。

伍、一段歷史插曲：北大南遷計畫的流產 (1919年5月)

前文敘述五四運動爆發之後，江蘇省教育會面臨教育大局的詭譎變化，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機敏應對，展現出該會同人的政治手腕。此外，五四高潮中發生的一段插曲，也透露江蘇省教育會同人的雄圖大略，以及其對北京教育界的影響力，實遠遠超出一般人的認知。

1919年5月22日，也就是「田消蔡回」消息確定後翌日，一封由上海黃炎培、沈恩孚、蔣夢麟寄給北京大學教授胡適的信函，透露出江蘇省教育會在挽蔡、留傅、拒田等事上的涉入程度，以及他們在教育方面的全國性布局。茲抄錄全文如下：

子公現已離滬返鄉。回校任職事，子公已允。此事若不另生枝節，大學可望回復原狀。留傅事，江、浙兩省教育會首先發難，上海學界留蔡後，亦復爭留傅。北京學生宣言已到，大為國人所許可。杜威先生來函，勸「忽餒氣，此為喚興國民潛力好機會」。加〔哥〕倫比亞已允給假，大學如散，上海同人當集萬金聘之。大概大學不至于解散，因

蔡既允復職（子公以不辦學生為復職條件，政府已明示，子公不得不復職矣），田當亦不敢長教育（京訊政府已撤回任田同意案）。現在所爭持者為青島不簽約及斥罷禍首二條，且看結果如何？子公在滬時每日相見，此公仍抱積極精神，轉告同志。

南方預備如左：

- 一、 同人所最希望者，為大學不散，子公自仍復職。同人當竭全力辦南京大學〔按：即後來之東南大學〕，有子公在京幫助，事較易。辦事後漸將北京新派移南，將北京大學讓與舊派，任他們去講老話（亦是好的），十年、二十年後大家比比優劣。〔黃炎培眉批：此亦是一句話，但弟意北方亦要占據，且逆料舊派無組織之能力也。炎。沈恩孚眉批：此時未打敗仗，萬無退回老巢之理。孚。〕況巴黎來電賠款有望，南洋富商亦可捐數百萬金，辦大學藏書樓、中央試驗室及譯書院。此事如子公在京，必多助力，故望諸君設法維持大學，以為子公返職地步。
- 二、 如北京大學不幸散了，同人當在南組織機關，辦編譯局及大學一、二年級，卷土重來，其經費當以捐募集之（炎、麟當赴南洋一行，《新教育》可請兄及諸君代編）。杜威如在滬演講，則可兼授新大學。

總而言之，南方大學必須組織，以為後來之大本營，因將來北京還有風潮，人人知之。大學情形請時時告我，當轉達子公。諸君萬勿抱消極主義，全國人心正在此時復活，後來希望正大也。請乞密告同志。⁹⁴

這封5月22日寄出的信函，說明江蘇省教育會在五四時期的南北布局。這班人野心之大、籌劃之密、組織力之強、集資能力之厚、政治手腕之純熟，在挽蔡、留傅、拒田、喚醒國民的過程中，著著南北呼應，其眼光不侷限於長江下游一帶。他們制定的策略是：「據南占北」。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是他們的重要布局之一，為了促成在南方設立一所新大學。不料五四運動導致蔡元培辭職，北京教育局面一時陷入混亂狀態，黃炎培等盡力修補，以期減輕事件的衝擊。同時，1919

⁹⁴ 黃炎培、蔣夢麟等，〈致胡適函〉（1919年5月22日），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頁29-30。

年5月蔣夢麟主編的《新教育》上，從人口分布，鼓吹「南方當急立大學」。⁹⁵這些動作在在顯示江蘇省教育會同人對於趕緊在南方設立一個「大本營」，確實有其固定的時程表，以求穩固拓展勢力。

不過，黃炎培等人也考慮到北方局面若持續混亂，不排除把北京大學遷到上海。細按上海報章可知，五四運動發生後不久，這班南方人士就有把北大遷移的打算。5月13日，一位署名「狄山」者投稿上海《時事新報》呼籲：

由全國教育界在南方共同組織一完全大學，即請蔡先生主持其事，俾京校學生遷而至南。其校中經費，由各省教育界公攤。此不特可以維持吾國學術界之一線生機，或更可因不受政潮鼓盪之故，思想上之刷新，愈增其速力。

咳！東南大學之設置，即無蔡校長之去職，即無解散北京大學之消息，亦已刻不容緩了。⁹⁶

5月23日，《時事新報》刊登上海學聯評議會成員潘公展的〈組織東南大學〉，透露出黃炎培籌劃南方大學的計畫。潘公展指出：

自學界怒潮風起雲湧起來，國人鑒於政府之存心摧殘教育，群有組織東南大學之謀。而北京大學學生苟自行解散，則其最後之目的亦在於此。查組織大學之議案，已經學生聯合會評議部公決實行，一俟有相當之時機，即出面請願於教育界及各界熱心公益之團體，此固無庸為諱者也。抑吾又聞之黃任之先生之言曰：「組織東南大學，即無北京學界之風潮亦已刻不容緩，苟北京大學而終於解散，則此舉尤為當務之急。況鄙人此番由南洋回滬，已稍有頭緒可尋，總當盡其力之所能至以維持教育一線之新機。」然則組織東南大學已為當世識者所公認，不獨一二人之私言也。⁹⁷

可見組織南方大學是上海學界的普遍要求，潘公展的論調也透露出此時黃炎培有

⁹⁵ 蔣夢麟，〈教育評論〉，《新教育》，第1卷第4期（1919年5月），轉引自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頁107。

⁹⁶ 狄山，〈挽救大學之辦法〉，《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5月13日，第3張版3。

⁹⁷ 公展，〈組織東南大學〉，《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5月23日，第3張版3。

組織新大學的具體計畫，且以此意對外說明，以期達到凝聚及引導輿論的效果。

潘公展上文中有一句話，提及「北京大學學生苟自行解散」，其最後之目的亦在組織東南大學一事，是很值得留意的訊息。5月21日潘公展尚有一篇〈敬告上海學聯〉刊在《時事新報》，其中透露：

考北京學生罷課之後，尚有「自行解散」之法。解散之後，尚有「南遷重組」之法。按步就班，有條不紊。⁹⁸

這裡說明北京（北大）學生的一連串罷課行動，本有長遠而積極的南遷計畫，絕非消極罷課而已。不過，由「罷課」而「自行解散」再到「南遷重組」，若無南方人士的支持乃至主動獻策，恐怕是難以想像的事。由此可以推想：五四時期南北教育界的連繫之深，遠遠超出一般人的認知。若論江蘇省教育會的地位，則黃炎培等在北京學校「南遷重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毋庸置疑的事。5月22日蔣夢麟等寄給胡適的信函，便是確鑿的證據。

因北京局面為關鍵所繫，蔣夢麟等寄出信函後兩天，忍不住再發信給胡適，追問北大內外情形：

久不得來書，想忙得很。……照你看來，大學究竟能否保存？照我的意思，如能委曲求全，終以保全大學為是。因為我們的第一條辦法是比較的好一點兒。如你看來，大學有不能保存之勢，也要早些寫信給我，我們可以早些兒預備你們來上海。……大學內部怎麼樣？教授會進行如何？要你對我說，我好講給蔡先生聽聽。我們兩種辦法，你有何意見？⁹⁹

蔣函表明江蘇省教育會對北大準備了兩套方案，上策為保全北大，下策為把北大新派移南。因胡適遲遲未覆，蔣夢麟兩天後又去信追問：

久沒有你通消息，記念得很。……大學現狀給我講講。千萬千萬，我實

⁹⁸ 公展，〈敬告上海學聯〉，《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5月21日，第3張版3。

⁹⁹ 蔣夢麟，〈致胡適函〉（1919年5月24日），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9冊，頁417-418。

在記念殺了。¹⁰⁰

到底北大內部情形如何？胡適等人是否確有南遷計畫？胡適遲遲不回信的原因何在？

翻閱北大資深教授沈尹默的回憶文字〈我與北大〉，其中一段記載與蔣夢麟的信函恰可印證。沈尹默說：

五四運動時，胡適以「革命」為幌子，主張把北大遷到上海。有一天，我和幼漁、玄同、士遠、大齊等人正在商量事情時，胡適、羅家倫、傅斯年進來說：「我們主張把北大遷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制。」我們回答說：「這件事太大了，要商量。」羅家倫和傅斯年接著說：「搬上海，要選擇哪些教員、哪些學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們去。」我們一聽，這是拆伙的打算，不能同意。因為弄得不好，北大就會分裂，會垮臺。於是決定在第二天早上七時開評議會討論。開會之前，我們要沈士遠去看胡適，告訴他，搬上海，我們不能同意。評議會討論的結果是不同意遷上海。胡適就來找我，他說：「以後北大有什麼事情，你負責！」我說：「當然要負責，不能拆北大的臺。」¹⁰¹

沈尹默的上述回憶，不知何故過去鮮少獲得研究者注意，也幾乎不見北大校史徵引。¹⁰² 或許人們以為沈文寫於1950年代，當時正值「批胡」高潮，沈氏與胡適復有多年宿怨，故對其回憶不予採信。但沈尹默的回憶文字，與蔣夢麟的信函所述相互印證。其中提及羅家倫、傅斯年的段落，又與蔣夢麟上函所言「新派移南」想法吻合。大抵胡適收到蔣函後，隨即與他最親近的幾個學生羅家倫、傅斯年商議，正式建議把北大遷到南方，不料此議未能獲得沈尹默等資深教員的支持。

¹⁰⁰ 蔣夢麟，〈致胡適函〉（1919年5月26日），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9冊，頁420-421。

¹⁰¹ 沈尹默，〈我和北大〉，收入王世儒、聞笛編，《我與北大：「老北大」話北大》，頁79。

¹⁰² 蕭超然《北京大學校史》引用曾文經〈五四運動前後胡適的政治面目〉一文，指出五四時期胡適一度建議把北大遷上海，可為旁證。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127。

翻閱另一位北大馬敘倫教授的回憶錄《我在六十歲以前》，其中也提到五四時期北大有南遷的計畫，可以補足沈尹默文所未交代的細節。馬敘倫寫道：

「五四運動」風潮高長的時候，我是每日從早晨八時到六時，有時直到八時以後，都在沙灘北大第一院（文學院）三樓臨街中間一間教員休息室呆守著，為了保持各方面的接觸。有一日，我已回家晚飯，忽然得到電話，是休息室工友打來，叫我去開會。我想，有什麼會？向來有會，我總事前接洽的，這是什麼會？但是不好不去。到了第一院問起工友，他只對我說：「東屋裏開會啦，有人在簽名啦」，我過東屋去一看，長桌上擺了一本簿子，寫著：「北大遷往上海，老師、同學愿（願）去的請簽名。」（原文記不清了，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員學生簽上幾個名字，我還記得有「五四運動」的「巨子」北大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的大名。我想，這真怪事！是什麼人的主張？我便退回休息室，且看動靜。一忽兒劉文典先生來了，他說：「開會？」我說：「不知道，我過你可以往東屋裏看一看。」他聽我的話有點蹊蹺，一看便來問我：「你看怎樣？」我說：「我們不是要奮鬥？奮鬥是要在黑暗裏的。」他轉身便走。第二日，他來告訴我：「昨晚我把你說的話告訴了獨秀，他說：「你的話很對。」他已把傅斯年、羅家倫叫去訓了一頓。」果然，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¹⁰³

馬敘倫的回憶提及傅斯年、羅家倫，與沈尹默的說法相合。大約南遷一事，傅、羅是學生輩的支持者。傅、羅背後，則有胡適與蔣夢麟等的默契。但南遷計畫未獲資深教授沈尹默、馬敘倫、陳獨秀等支持，卒未見諸實行。沈尹默等強烈反對南遷，一方面或許是恐怕北大因此垮臺，另一方面或許擔心他們從此失卻對北大的控制。

在諸意見分歧中，6月間北京傳出傅斯年、羅家倫已被安福部收買的消息，此一說法且透過各報館的網路傳到南方。胡適為此出面闢謠，在《每週評論》上駁斥：

¹⁰³ 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引自王世儒、聞笛編，《我與北大：「老北大」話北大》，頁63-64。1990年臺北龍文出版社印行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脫漏了整整一頁面，其中包含這個重要段落。

自學生愛國運動發生以來，有人造出一種謠言，說北大的新潮社社員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俱樂部收買去了。上海有一家大報的駐京訪員竟把這種謠言用專電傳出去！……我們正式回答他們：「安福部是個什麼東西？他也配收買得動這兩個高潔的青年！」¹⁰⁴

傅、羅被傳為安福部收買的消息，夾雜了新舊文學陣營對立的情緒。其實，胡適、傅斯年和羅家倫主張北大南遷，主要是想保存北大、繼續推動文化運動。在他們看來，保存北大比爭外交問題重要，江蘇省教育會中人與他們看法一致，且提供北大南遷的方案。然而，傅、羅之建議，或許被愛護北大者疑心他們被人收買。當時蔣夢麟還去信安慰傅斯年，¹⁰⁵ 此舉或即江蘇省教育會為此方案幕後支持者之旁證。

總括來看，江蘇省教育會對教育發展極其重視，他們在五四運動中積極籌建南方大學，甚至一度考慮協助北京大學南遷。而胡適與蔣夢麟的私交，使他承擔起連繫南北學界的角色。總之，這一次未能實現的北大南遷計畫，很能說明江蘇省教育會的全國性眼光，以及南北新派人物的微妙連繫。

陸、學潮失控，袁去蔡退 (1919年5月23日至6月5日)

回來說到5月23日，當黃炎培、蔣夢麟等為「田消蔡回」的消息大感振奮之際，袁希濤密電中提到北京局勢卻愈來愈令人憂心：

自政府聲明撤回田某同意案後，學生復以懲辦曹、陸問題一致罷

¹⁰⁴ 適，〈他也配〉，原載《每周評論》，第28號（1919年6月29日），收入胡適，《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卷，頁172。

¹⁰⁵ 這是蔣夢麟在傅斯年逝世後透露的消息。蔣氏回憶：「我識孟真遠在民國八年。他是五四運動領袖之一。當時有人要毀掉他，造了一個謠言，說他受某煙草公司的津貼。某煙草公司，有日本股份。……我在上海看見報上載這個消息，我就寫信去安慰他。但是當時我們並沒有見過面。」蔣夢麟，〈憶孟真〉，收入蔡尚志編選，《長眠傅園下的巨漢》（臺北：故鄉文化出版事業經紀公司，1979年），頁64。

課。……將有不能維持之勢。至懲辦曹、陸問題，政府因各方面關係，於事實上亦不能照辦。學生此次要求目的，既難達到，而妨礙秩序之事實，又復迭生。則外省言論上之鼓吹，此時似宜相機注意，以免青年熱度沸騰，至不可收拾之地位。特此密告。¹⁰⁶

袁希濤密電所謂「外省言論上之鼓吹，此時似宜相機注意」，是一個確鑿的證據，說明袁希濤與南方暗通消息。袁、黃等發動「外省言論上之鼓吹」，欲利用輿論壓力迫使北京政府讓步。但輿論上的熱烈鼓吹，也造成學生心理上的激盪。5月19日北京學生全體罷課，要求政府答覆學生6項要求，否則不肯復課。然而，5月23日袁希濤電表明，南方黃炎培等人期盼的「青島不簽約及斥罷禍首二條」，北京政府實際上無法辦到，而此時學生行動日趨激烈，已不是袁希濤或任何人抑制得來的了。

在京、津、滬學生相繼罷課下，袁希濤陷入進退兩難之困境，5月25日上海《申報》報導：

昨日（二十二）午後三時，教育次長袁希濤親至北京大學召集專門以上各學校校長為再度之疏通，屆時到會者除私立學校校長全體到會外，各官立學校校長無一與會者。（緣官立專門校長因前日疏通無效，覺此事毫無辦法，昨已第二度提出辭呈……。）時至下午三時半，袁次長同各私立校長及警備司令部虞處長……同出席於學生聯合會。該會是日祇有各校學生代表六十三人，先由中國大學校長姚君詢問學生聯合會現已議有辦法否？次虞君演說。次袁次長演說，略謂：中國教育基礎之危險，萬不可使其再陷於搖動之地位，望學生務以顧全大局、保持國家元氣為重，故仍望即日上課。又演說團一層，諸生本為提倡民氣起見，政府對於學生愛國熱誠極能諒解，惟地面秩序萬一因此發生問題，則愛國反以害國，尤望即日停止遊行講演，以防危險云云，說至此聲淚俱下。

袁次長演說畢，與各校長及虞君同退出，俟學生自行商議，及六時

¹⁰⁶ 「袁希濤為政府不能懲辦曹陸防止局勢不可收拾密電」（1919年5月23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頁304-305。

半，復入會場詢學生所議之結果。學生仍堅持非懲辦國賊之目的達到，決不上課。至講演一層，曲諒政府苦衷，暫行停止，俟定有穩妥辦法再行出演。散會時，鐘已七下，各學生皆大呼中華民國萬歲，聲聞戶外。袁次長回部之後，即擬定自行辭職，謂事勢如此，實無轉圜妙策。¹⁰⁷

袁希濤夾在政府和學生之間的無力和無奈，在報導中有極為詳細的描述。局勢發展至此，袁希濤只有辭職一途。

5月25日，大總統徐世昌忽然嚴令下達，要北京及京外長官負責維持地方治安。同日，教育部下令各校校長會同教職員於3日內督率學生一律上課。¹⁰⁸

這時候袁希濤的若干表現，頗令外界譏議。上海《民國日報》引述中美通信社消息：

日昨國務院開會討論對待學生辦法，警察總監吳炳湘、步軍統領王懷慶、教育次長袁希濤等皆列席。袁希濤自告奮勇，謂限學生於三日內一律上課，否則重懲。聞袁氏從前反對田應璜長教長甚力，近頗覬覦總長一席，甘心折節以媚武人而壓學生，識者莫不鄙之。¹⁰⁹

中美通信社具美方背景，對北京政府不很友善。¹¹⁰ 惟該報導提及袁希濤主動建議限期上課，則有一定的根據，倒不是出於惡意杜撰。¹¹¹ 細按袁希濤的3日上課限令，原擬促成學生上課，以免教育局面失控，反給予政府干涉的藉口。

然而，北京學生面對上課限令，仍堅拒讓步。5月31日上海《申報》報導學生的態度：

¹⁰⁷ 〈京學界仍堅持罷課〉，《申報》，上海，1919年5月25日，版7。

¹⁰⁸ 彭明，《五四運動史》，頁314。

¹⁰⁹ 〈袁希濤想做總長〉，《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5月29日，版6。上海《民國日報》引用中美通信社醜詆袁希濤的報導，其中別有深意。

¹¹⁰ 陸建德，〈校長之憂——兼聽「五四」雜音〉，《書城》，2009年5月號，頁17。五四時期《申報》記者指出：「中美通信社為美人波爾君主任，而以陳君廷謨經理兼充翻譯。自外交風潮發生，對於學界舉動，頗持正論，遂為親日派所嫉視。」戈二，〈北京快信〉，《申報》，上海，1919年5月31日，版7。

¹¹¹ CS生，〈北京學生最近的狀況〉，《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6月5日，第1張版2。

自教育部於二十五日訓令北京大學等二十三校及京師學務局所轄學校限三日內一律照常上課後，各校校長並教員於二十七日會集前往教育部面晤袁次長，商議維持學校辦法。當時袁次長依照前項訓令，限學生於三日內上課。各校長遂即本袁次長意見，各回本校向學生方面宣布。於是北京大學、高等師範等二十餘校代表，二十八日特在高等師範風雨操場會議，討論對待教育部限令三日內一律上課之辦法。各校代表共同決定：自明日（二十九日）起繼續罷課。各校學生均將行李書籍等物收束齊備，專俟政府下解散令，即行全體出校。¹¹²

5月29日，即學生決定繼續罷課那一天，南北各界密切關注教育部的舉動。這一天，袁希濤密電上海黃炎培：

勘電〔按：二十八日電〕悉，前限三日上課，表面以部令督促，內容係由各校分別勸導。惟外省日有罷課電到，京校益難挽回，今日限滿，部中持冷靜態度，以息外間訛言。聞學生方面，已漸有請假回籍者。¹¹³

從袁希濤電可知，所謂「3日內一律上課」的期限，教育部未嚴格執行，僅交各校分頭勸導。¹¹⁴ 惟這時上海學生為了聲援北京學生，已於5月26日罷課。27日，山西學生罷課。28日，南京學生罷課。消息傳到北京，京校學潮愈難挽回。

再觀5月31日北京《晨報》報導，又可知袁希濤在上課期限到後，仍望用柔性勸說平息風潮：

教育部前以部令，限各校於二十七日以前上課，卒歸無效。該部昨日又派出部員十餘人，分赴各校巡視，以覘學生有無轉圜之希望。乃到各校時，不止校中無學生，且并教職員亦少在校者。聞教育次長袁希濤於無可如何之中，作異想天開之舉，竟欲提前一個月放暑假，以為敷衍緩和

¹¹² 〈京學界不受壓迫上課〉，《申報》，上海，1919年5月31日，版7。

¹¹³ 〈袁希濤關於限令上課期滿部持冷靜態度密電稿〉（1919年5月29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頁238。

¹¹⁴ 《英文滬報》對袁希濤的角色亦有誤解，以為袁氏主張用強迫手段威嚇學生上課。引自〈北京今日之怪現狀〉，《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6月4日，第2張版1。外人報刊對袁希濤的報導，反映其對北京政情的隔膜。

之計。昨聞高等師範及國立法政兩校已實行放假，如此則學生不居罷課之名，教部亦可自完其面子矣。¹¹⁵

至於上海、南京地區情形，據5月31日北京《晨報》報導：

上海學生停課後，教育部已電蘇省教育廳長赴滬調查並勸導學生。另電江蘇省教育會唐文治等設法維持。最近南京方面亦有波動之訊，僅教育、警察兩廳竭力勸止，已即上課。惟另向中央指發一電，有所請求云。¹¹⁶

總之，袁希濤並未嚴格執行3日上課限令。此外，《五四愛國運動檔案史料》收錄5月31日袁希濤致江蘇省教育廳廳長胡家祺密電，提到「3日期限」的「執行」狀況：

卅電悉。北京各校前限三日上課，屆滿後，各校長請略寬期限，再加勸導。現有舉行考試及溫課者，均未上課。校外行動，經嚴重干涉後，尚無越軌情事。校內亦尚安靜。部中不發提前放假之命令，但各校得酌量情形辦理。此覆。濤。卅一。¹¹⁷

可見袁希濤對延展上課之令採用彈性手段，意圖降低此事的衝擊。密電中提到「部中不發提前放假之命令」，亦值得重視。其後袁希濤的繼任者，上臺後馬上要「各校長責成上課，否則提前放假」，¹¹⁸ 可見袁希濤不願出此策略者，正在於不擬學生就此散去。

袁希濤小心處理學潮之際，6月1日大總統徐世昌又下達兩道指令：首先，他為曹、陸、章3人辯護，稱讚他們在對日事務上「各能盡維持補救之力」。二、「在京著責成教育部，在外著責成省長及教育廳，警飭各校職員，約束諸生。即日立即上課」。徐世昌的兩道命令，顯然是想加緊控制局面，後一項指令更針對

¹¹⁵ 〈各校罷課問題昨聞〉，《晨報》，北京，1919年5月31日，版2。

¹¹⁶ 〈各校罷課問題昨聞〉，版2。

¹¹⁷ 「袁希濤關於不發提前放假令密電」，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頁204。

¹¹⁸ 〈北京電〉，《申報》，上海，1919年6月8日，版4。

袁希濤而發。這時徐氏急於恢復秩序，已對袁希濤失去耐心。¹¹⁹ 大總統的兩道指令，卻激起北京學生更激烈的行動，6月3日起學生恢復街頭講演。¹²⁰

1919年6月3日上午，報載：「北京各校學生數千人四出講演，政府逮捕1千多名學生，扣留在北京大學法科大禮堂，情勢急劇惡化」。6月3日中美通信社報導警廳拘留學生後：

電告教育部派員赴北大任管理之責。教育部於今日學生演說之後，又見政府之辦法，已苦無補救之策，聞次長袁希濤已預備辭呈，於今晚提出。¹²¹

某些記者不諳袁希濤困境，對他頗有責難。6月6日上海《申報》引述「北京快信」：

下午五時許，私立匯文中學、中國、朝陽、民國四大學校長相偕至教育部謁袁次長，要求釋放拘禁之學生，撤回駐校之兵警，袁竟辭以無此權力。四校長請同赴國院見錢總理，不達目的誓不告退，愚草此信時，四校長尚在教部，袁尤拒而不允，正相持間也。¹²²

北京政府、學生態度各趨強硬下，袁希濤再遞辭呈。6月5日北京《晨報》報導：

教育次長袁希濤氏前日因學生風潮愈形擴大，三次晉謁錢幹丞總理，均被拒絕。袁氏自思無維持方法，乃於當晚將辭職呈文送交公府，措辭異常堅決。¹²³

錢能訓3次拒見袁希濤，對袁毫不留情面，其不滿已溢於言表。

6月8日上海《申報》復報導6月3日袁氏3次求見錢總理被拒詳情，其中細節

¹¹⁹ 1919年5月29日北京《晨報》，即有標題「昨日各校仍未上課 教育部訓令之失效」的報導，版2。

¹²⁰ 彭明，《五四運動史》，頁316。

¹²¹ 〈北京大捕學生之別報〉，《申報》，上海，1919年6月6日，版7。

¹²² 勿勿，〈北京快信〉，《申報》，上海，1919年6月6日，版7。

¹²³ 〈昨日教育部及各校長之行動〉，《晨報》，北京，1919年6月5日，版2。

值得留意：

三日，大學教職員九人在教育部交涉，自下午四時至夜十二時始散。各校校長亦打電話至四、五次，皆未得有結果。其間之誤事，則一為袁希濤派秘書陳某赴警廳交涉。歸來報告，只為警廳許發通行證，使在法科之教職員得以出入，而校舍尊嚴之根本問題反置腦後。二為陳某交涉未得要領，以後各教職員要求袁氏親見錢能訓言之，而袁氏不肯遽往。一次電話則曰：容再回復。二次電話則曰：總理已歸。三次電話至錢宅，則曰：總理已睡。以是虛過一宵。次日集於學界俱樂部，袁希濤自往謁錢，彼此相對作（無辦法）數語而止，亦無結果。¹²⁴

這則報導說明袁希濤及其下屬無力處理學潮，更透露出錢能訓有意令袁氏難堪，目的是逼袁求去。

另外，6月5日北京《晨報》報導，6月4日袁氏迫於北京各校校長請求，不得不以代理教育總長身分，再一次謁見錢能訓總理。這次錢、袁見面，顯示雙方關係之惡劣：

昨早八時，教育部部員乃約集各學校校長陳寶泉等至學界俱樂部磋商維持方法，全體公決，非先要求政府將圍守大學之軍警解除，不能言第二步之調停方法。旋即推定教育部參事湯中及秘書某君晉謁總理，嗣由某君提議，謂袁次長以代理總長資格，昨日（即前日）曾三次謁見總理，均被拒絕，足見總理對於此事尚有隱衷。今日如以教育部代表名義求謁見，則總理當然照例拒絕，遂改由全體名義，要求袁次長再盡最後之人事，請求謁見總理一次，以便陳述利害。袁次長不得已，復於昨日上午十時晉謁總理。總理開口即問：教育部對於此次學生風潮有無辦法？袁次長答教育部因無辦法，故來請示總理。總理謂教育部對於此事既自無處置方法，余（總理自稱）當仔細思量一妥當解決方法。次謂前次各校校長來院時，余已面飭其勸令學生早日上課，事隔多時，不但毫無效果，且近日學生反四出講演，政府除派兵圍守禁其外出，試問有何辦法？袁次長復力求總理准其辭職，總理亦照例加以慰勉，袁氏遂告辭而

¹²⁴ 霜羽，〈北京通信〉，《申報》，上海，1919年6月8日，版5。

出，然並未到部視事云。¹²⁵

觀錢能訓、袁希濤對話如此之僵，可知袁氏去職必不可免。此時袁希濤固心力交瘁，錢能訓對袁不留情面，也令人印象深刻。

6月6日上海《申報》據《京報》消息，復說明6月4日袁希濤辭職過程：

教育袁次長昨因學生風潮再起，下午遂再提出辭職呈文。各校主任昨晚又赴部商議辦法，至晚十一時，次長尚在部與各校校長接洽，然迄無解決辦法。昨日事發以後，政府中再商處置此案之辦法，外間有解散大學今已擬稿之傳說，但詢據袁次長，則稱絕對不知。再詢政府方面，亦尚否認，而以提前放暑假之主張為最力，聞今日尚須與袁次長會商辦法云。¹²⁶

由《申報》報導顯示，政府（總理）與教育次長袁希濤對處理學潮問題，顯然各持不同主張。對「解散大學」或「提前放暑假」，政府似有特定看法，惟礙於次長袁希濤的不同意見，雙方尚在溝通之中。事實上，「解散大學」或「提前放暑假」，都將對學界造成打擊。袁希濤的保留態度，可見其欲保存大學之初衷。不過，從上段報導可見，此時袁希濤不但無力掌控教育大局，更無法主導政府對學潮的處理方式。錢能訓總理對袁希濤的不信任，更是眾所周知的事。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再次傳出新教育總長人選。6月5日北京《晨報》傳出消息：

昨晚某要人力向政府當局陳述辦法，謂此次風潮愈鬧愈大之原因，實因政府、學生各走極端之故。如欲調停此次，非請居第三者，地位又在教育界素有聲望之人出而維持，實無其他方面。並謂嚴範孫、張仲仁、王亮疇、范靜生等，皆可以作此等調人。惟聞必須政府及學生兩方面有意轉圜，則嚴、張等或可任此艱難。惟同時又聞某派中人極不贊同此說云。¹²⁷

¹²⁵ 〈昨日教育部及各校長之行動〉，《晨報》，北京，1919年6月5日，版2。

¹²⁶ 〈北京大捕學生之別報〉，《申報》，上海，1919年6月6日，版7。

¹²⁷ 〈昨日教育部及各校長之行動〉，版2。

報導中的「某派中人」，暗指態度強硬的安福系。安福系之所以「極不贊同」由嚴、張、王、范出任「調人」，說明其態度極為強硬，不願接受任何妥協方案，意欲對學潮採取嚴厲手段。

1919年6月5日，北京政府內閣會議作出議決：批准代理教育總長袁希濤辭職，以傅岳棻繼任。6月6日北京《晨報》報導，認為袁希濤去職是安福系強烈主張所致。其事之定，則在6月4日夜。報導指出：

教育次長袁希濤因學界風潮無法調停，一再辭職。錢總理特於四日晚間召集全體閣員暨王揖唐等，在私宅籌議善後辦法。微聞是晚王揖唐主張先撤換袁希濤，後再議辦法。在座者咸然其說。遂由錢總理諮詢繼任人物，王揖唐舉傅嶽芬以對，錢允之。至昨早安福俱樂部因此特開會議，一致贊成以傅繼袁。議畢由王揖唐以電話通知錢總理，而此項命令遂於昨日下午發表矣。聞傅定於今日上午十一時到部視事，至其今後如何調停學界風潮，尚未聞其有所表示，吾輩拭目以待之。¹²⁸

由這則報導看來，安福系領袖王揖唐是力主撤換袁希濤的要角，繼任次長人選傅嶽棻也是王氏所推薦。這一個動作，很可能是報復袁希濤在田應璜案上的表現。¹²⁹

胡適對此事的評論，在其1928年撰寫的〈五四運動紀念〉中有一段話，表明他對去職者的好感。他說，五四學生運動發生後：

當時辦教育的人，就棘手了，好在他們亦不欲在這種腐敗的政府下供職，於是教育部中幾個清明的職員及北大校長蔡元培等人，相繼辭職。那時，政府正痛恨那一班人，他們既欲辭職，亦不挽留。¹³⁰

¹²⁸ 〈教育次長更迭經過情形〉，《晨報》，北京，1919年6月6日，版2。1919年6月8日上海《申報》亦摘錄了這則京中報導，版5。

¹²⁹ 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說：「這時〔五四以後〕，教育總長范源濂辭職離京，次長袁希濤代理部務，我們教聯會代表頭二十個，死纏住了他，好像討債的，他也只得『掛冠而去』。」轉引自王世儒、聞笛編，《我與北大：「老北大」話北大》，頁63。馬氏之說頗成問題，一則誤記當時教育總長的名字，應是傅增湘而非范源濂；二則對袁希濤的身分似無所悉。總之，其說不足為據。

¹³⁰ 胡適，〈五四運動紀念〉，原載1928年5月10-11日《民國日報·覺悟》，引自胡適，

胡適所說的「那一班人」，無疑指先後辭職的教育部總長傅增湘、次長袁希濤兩位，他對他們的好感和同情有清楚明白的流露。

傅嶽棻既為安福系所薦，其出任次長一職，標誌安福系終於插足教育部。1935年12月28日湯爾和致胡適函上，就指出傅嶽棻的角色：

八年底罷課事，其中內幕重重，均為日記所不載。當時在五四以後，政府確有收拾各校之心。傅之來即係為安福出力，曾口出大言，謂能一手包辦，以致各校異常憤激。渠之目標，首在北大，尤為子民。用胡〔仁源〕去蔡，已見事實。¹³¹

湯爾和是五四前後北京校長團主腦，他的回憶揭示了傅嶽棻與安福系的關係。湯函原為說明1919年底罷課的原因，指出五四後傅嶽棻出掌教育部的意義，肩負替安福系整頓教育界的任務。後來傅嶽棻友人熊十力也說他：

少襄南皮張公幕，雅負時望。入民國，曾贊中樞，長教部。五四運動，維護北庠，用心深遠，今之能言其事者已鮮矣。¹³²

熊十力之言，從一個側面說明傅氏支持北洋政府的立場，是與傅增湘的態度迥別的。

誠如湯爾和函所說，傅嶽棻出任次長後，馬上把目標對準蔡元培。6月5日北京政府內閣會議作出決議：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辭職，以胡仁源繼任。6月6日《晨報》報導：

聞政府更迭教育次長之後，已決定准北大校長蔡元培辭職。其候補者原擬王樹枏，因王不就，改擬前任北大工科長之胡仁源。聞昨日閣議業已通過，不日即可發表云。¹³³

《胡適全集》，第21卷，頁366。

¹³¹ 湯爾和，〈致胡適函〉（1935年12月28日），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6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頁509-510。

¹³² 熊十力，《論張江陵》（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頁4-5。

¹³³ 〈北大校長之候補者〉，《晨報》，北京，1919年6月6日，版2。

袁去繼之以蔡退，可見維護袁希濤是蔡元培留任的主因。1930年袁希濤逝世後，蔡元培為文追念：

五四學潮起，大有風雨滿城之勢，教部適當其衝，頗難應付。幸賴袁公周旋其間，奔走各方，不辭勞瘁。¹³⁴

黃炎培等在〈袁觀瀾先生事略〉中，也對袁氏的去職有所說明：

五四運動事起，蔡、傅二先生卒然相繼出都，先生力任艱巨，周旋維護，終以力瘁辭職。¹³⁵

袁希濤「維護」蔡元培留任北大校長的苦心，應是無庸置疑的。外界不察，才有各種誤解和質疑。例如周策縱的五四研究專書中，便對袁希濤去職作如下評論：

代理教育總長袁希濤面臨來自軍方及學生、社會團體兩方面的壓力，感受到除了辭職以外，找不到其他擺脫困境的出路。同時，內閣由於面臨如此強烈的抗議，立場也再次出現動搖。在政府手裏已有1,000名被捕學生的那天晚上，內閣在總理私人官邸召開會議，決定接受袁的辭呈，并任命另一位次長傅嶽茶接任代理教育總長。從此，總統府便放棄了一切用武力解決學生問題的企圖，開始試用說服的策略，但固執其外交政策、留任3名被攻擊官員的決心并未削減。……代理教育總長的撤換為妥協開闢了道路。¹³⁶

周策縱可說嚴重誤判袁希濤的角色，也未諳政府撤換袁希濤的真正原因。之所以產生誤判，即為6月5日以後，北京政府對學生的態度出現轉圜，周氏遂以為與袁氏去職有關。

¹³⁴ 蔡元培，〈袁觀瀾追悼會開會詞〉（1930年9月20日），收入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6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541。

¹³⁵ 黃炎培等，〈袁觀瀾先生事略〉，頁373。

¹³⁶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p. 158-159. 奇怪的是，周策縱書註腳中，引用杜威夫婦8月4日的紀錄時，指出「現任代理教育總長傅嶽茶的上任似乎有3個條件：解散北大、阻止校長回校、解除北京各高等學校所有現任校長職務。」杜威夫婦的消息應來自北京教育界。若傅氏上臺的3個條件屬實，反映北京政府希望他採取強硬手段，而非如周氏所說，認為傅氏上任「為妥協開闢了道路」。

其實，從6月8日上海《申報》「北京通信」看來，觀察家早就指出北京政府的態度轉變，是由於上海傳來罷市消息：

究其所以肯撤退軍警之由來，則上海已經罷市，北京商界亦有一種表示。¹³⁷

6月7日上海《申報》「北京電」有同樣的看法：

上海商界罷市表同情於學生之報告傳到北京後，政府政策倏然一變，所有被拘學生皆已釋放，各校駐兵業已撤回。（五日）¹³⁸

可見上海商人罷市才是錢內閣態度轉變的根本原因。周策縱誤以為袁希濤去職標誌著北京政府態度軟化，既誤判了政局轉圜的原因，也未能瞭解袁希濤的真正角色。¹³⁹

再者，該年底上海《民國日報》對歷任教育總長、次長所作的評論，也明白揭示袁希濤和傅嶽棻的背景迥異：

自民國成立以來，教育當局皆教育界負重望之人物，新如蔡元培，舊如傅增湘，不新不舊如范源濂，皆在教育界中素日占有地位。即次長中之董鴻禕、梁善濟、袁希濤，亦尚過得去。自今年（六三）風潮，總次長均以與武斷派之主張不合，棄職以去。於是銓敘局參事傅嶽棻，乃得以次長代部，聞者詫之。¹⁴⁰

上海《民國日報》對北洋政府素持反對態度，其對袁、傅的不同評價，間接說明袁希濤確實不是北京政府的同路人。

近年臺灣出版的《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收錄6月12日田應璜致太原閻錫山的密電，更透露出向來不為人知的訊息：

¹³⁷ 霜羽，〈北京通信〉，《申報》，上海，1919年6月8日，版5。

¹³⁸ 〈各通信社電〉，《申報》，上海，1919年6月7日，版4。

¹³⁹ 彭明書則看出北京政府的軟化，是因為上海傳來「三罷」消息。彭明，《五四運動史》，頁320-321。

¹⁴⁰ 〈傅嶽棻釀成學潮真相〉，《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12月30日，版3。

頃晤總統，謂袁希濤已否到晉，雖未確知，既有此說，恐其煽動學生如上海之擾亂，……不可不慮。¹⁴¹

由田應璜的密電清楚可知，徐世昌認為上海學生的罷課風潮是由袁希濤一系鼓動。這一通電文，令我們恍然於袁希濤的遭受免職，是因為徐世昌政府對他的根本不信任。更進一步說，也是對江蘇省教育會一派人的深致不滿。換言之，袁希濤的遭到免職，不僅是無力平撫學潮，更背負著煽動學生的重大罪責。

總之，6月5日袁去蔡退，是江蘇省教育會「據南占北」策略的嚴重挫敗，也是安福系插手教育界的第一步。安福系欲占領教育陣地，代表北洋武治派向南方江蘇省教育會轉用攻勢，意在摧破江蘇省教育會在北方的陣地。學生罷課引起袁、蔡雙雙去職，恐怕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也非他們所樂見。袁希濤去職消息發布後，嚴修在日記中評論：

學界風潮日甚一日，昨日遂有袁次長免職，授傅嶽茶以教育部次長，代理部務之令。外交無絲毫之補救，教育有根本之推翻。彼倡始者，安知結果之竟至於此也。¹⁴²

嚴修竟以「教育有根本之推翻」來形容袁去傅上，可見事態之嚴重。然而，1919年6月5日上海的「三罷」事件，為局面帶來了翻轉的契機。江蘇省教育會在「三罷」事件中，則扮演了一種關鍵性角色，且待另文詳論。

柒、結論

總括來看，本文對1919年五四時期歷史面貌的勾勒，雖未能描繪出一幅完整的圖象，卻已有力地指出：想瞭解一部五四運動史，不可以僅注意北京大學及蔡元培校長的活動，也需對南方教育界要角投以充分的注意力。單就五四運動第一階段而論，即顯示流行已久的「北大中心論述」乃至「蔡元培神話」，確實有

¹⁴¹ 何智霖編註，《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5冊（臺北：國史館，2003年），頁63。

¹⁴² 《嚴修日記》編輯委員會，《嚴修日記》，1919年6月6日條下，第4冊，頁2266上。

重新檢視的必要。此說並非想否定北大及蔡元培的重要性，而是想指出五四前後的江蘇省教育會，實是中國教育界一股絕大的勢力，其勢力遠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之上。蔡元培出掌北大，也是在他們的支持之下方始達成，是他們安置在北方的重要盟友。胡適在1918年認為黃炎培是「當今教育界一個最有勢力的人」，¹⁴³ 是深深值得玩味的局中人語。然而，若非深悉江蘇省教育會要角的歷史、謀略及政治運作方式，都不免簡化或扭曲了這一段歷史的進程，難以獲得五四運動史的真貌及全貌。

本文的論析也充分說明，1919年前後中國處於南北分裂時期，江蘇省教育會以南方為根據地，在長期積極的經營布局下，漸漸將其勢力拓展至北方地區，包括北京教育部及北京大學均在其視野之內。當廣州政府與北京政府對峙時期，長江流域下游的這股政治—經濟—教育界勢力，是牽動大局的不可忽視的力量。五四運動爆發之後，北大校長蔡元培及教育總長傅增湘先後去職，是該會向北拓展的頓挫。面對這一危局，江蘇省教育會首腦迅速制定挽蔡、留傅、拒田之策略，運用電報往返，策動南北輿論向北京政府施壓，巧妙地與學潮相呼應，不斷干預著北大校長、教育總長人選之進退，展現出靈活而綿密的政治手腕。論到運籌帷幄之能、人脈網絡之密，在教育界可謂一時無兩，其社會聲望更遠遠超邁北京政府之上。學潮即使引起袁希濤、蔡元培雙雙去職，都未能摧破該會在教育界厚植多年的勢力。總而言之，考察五四時期教育界的面貌，必須注意江蘇省教育會的角色，才能豐富我們對這一階段歷史的認識，不至於錯認推動這一段歷史進程的潛在動力。

¹⁴³ 胡適，〈致母親函〉（1918年6月20日），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1冊，頁267。

徵引書目

一、報紙

- 《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
《申報》，上海，1919年。
《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
《晨報》，北京，1919年。
《新聞報》，上海，1919年。

二、專書、專書論文

- 《嚴修日記》編輯委員會編，《嚴修日記》，第4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黃炎培日記》，第3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年。
- 王世儒、聞笛編，《我與北大：「老北大」話北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 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 何智霖編註，《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5冊。臺北：國史館，2003年。
-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
-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 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
- 呂芳上，〈「學閥」乎？「黨化」乎？——民國十四年的東南大學學潮〉，收入

- 氏著，《民國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
- 谷秀清，《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 來新夏等，《北洋軍閥史》，上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林輝鋒，《馬敘倫與民國教育界》。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 保羅·S·芮恩施（Paul S. Reinsch）著，李抱宏、盛震溯譯，《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1913-1919年美國駐華公使回憶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
- 胡適，《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 倪波等，《江蘇報刊編輯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
-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 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
- 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9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
- 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臺北：龍文出版社，1990年。
- 高平叔等編注，《蔡元培書信集》，上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 梁柱，《蔡元培與北京大學（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 陳以愛，〈「五四」前後的蔡元培與南北學界〉，收入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
- 陳旭麓等主編，《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黃炎培，《八十年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
- 熊十力，《論張江陵》。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
- 劉正偉，《督撫與士紳——江蘇教育近代化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劉厚生，《張謇傳記》。香港：龍門書店，1965年，1958年上海龍門聯合書局初版。
- 蔣夢麟，《西潮》。香港：磨劍堂，1960年。
- 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6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 蔡尚志編選，《長眠傳園下的巨漢》。臺北：故鄉文化出版事業經紀公司，1979年。

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

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卷19-20。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

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先生年譜》。天津：齊魯書社，1990年。

Chen, Joseph 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The Making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Leiden: E.J. Brill, 1971.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Yeh, Wen-hsin.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三、期刊論文

林輝鋒，〈「五四」運動中的「留蔡助蔣」再探〉，《學術研究》，2007年11期（2007年11月）。

馬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以「挽留蔡元培」為中心〉，《史林》，2009年第6期。

陸建德，〈校長之憂——兼聽「五四」雜音〉，《書城》，2009年5月號。

黃炎培，〈史量才先生之生平〉，《人文月刊》，第5卷第10期（1934年12月）。

四、學位論文

陳昫秀，〈清末的江蘇教育總會（1905-1911）〉。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Schwintzer, Ernst P. "Education to Save the Nation: Huang Yanpei an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Movement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Ph.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2.